

台灣古典詩之微觀研究嘗試

——以戴潮春事變初期之陳肇興詩為例

顧敏耀

中央大學兼任講師

摘要

台灣古典詩文的研究在近10年來頗有異軍突起之勢，率先研究的前輩學者專家們不僅呈現出優秀傑出的成果，更引領著學術新血繼續在此領域辛勤耕耘而開花結果。回顧與展望之際，筆者認為「微觀」或曰「細讀」應是值得肯定的研究方法，而本論文設定的實際操作對象陳肇興（1831-1866？）是台灣清領時期中部地區的重要詩人，牽涉到的戴潮春事變（1862-1864）則為台灣史上歷時最久的民變，詩人親歷其事，且身處戴軍的核心地帶，寫下許多極具現實精神的詩作，在台灣古典詩史上的社會動亂／戰爭主題書寫方面，不管就詩作數量與深入程度而言，陳肇興堪稱無人出其右。筆者挑選從「戴案爆發前夕」一直到「陳肇興萌發謀刺戴潮春的想法」之前的47首詩作做為研究焦點，經過細緻探討詩中運用的典故、破譯其背後的文化符碼、與其他相關歷史文獻相互比較之後，得以體會他詩作中的深刻意涵與言外之意，並與其他學者針對相關議題進行對話／辯證，進而重新發掘這些詩作的歷史與文學價值、讓詩人的真正面貌清楚顯現，更藉此而對先前的研究成果進行再思考與再考證，庶幾得以呈顯此一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所在。

關鍵字：萬生反 《陶村詩稿》 彰化文學 新歷史主義 清領時期

台灣古典詩之微觀研究嘗試

——以戴潮春事變初期之陳肇興詩作為例

前言

台灣文學研究從1987年解嚴以來，從「險學」逐步發展與邁進，雖然還沒有真的成為「顯學」（國內的中國文學研究在數量上仍佔優勢），不過，此一領域已有許多傲人的豐碩成果。解嚴迄今剛好滿20年，在這塊台灣文學研究的花園中，有一塊領域從原本少人注意的邊緣地帶，躍升為滿目奇花異卉、引人讚嘆不已的美麗景象，那當然就是「台灣古典文學」的研究——不止聚焦的詩人、作品或文類都持續的推陳出新，論述的深度與廣度也一直提升，實在讓人頗感欣喜。許俊雅便整理出到戰後到2000年的台灣古典文學的學位論文總共有105篇，不過在1990～2000年間產生的台灣古典研究的單篇論文則多達132篇，^[1]當然，2000年迄今的研究論文篇數當然又大幅成長，蔚為大觀。不過，也有學者對此不以為然，筆者曾在2002年1月12日在清華大學參加「人文社會學術的文化轉向」學術會議的「文化研究論壇」，會議中一位身兼作家的教授辛辣而直接的表示，他認為中文系學界研究台灣文學會拓展到台灣古典文學領域，是因為分析工具比不上外文系學者、知識結構與意識結構都出問題、且意識形態封閉所致。真的是這樣嗎？有影無？

筆者認為絕非如此，事實上，許多在此一領域卓然有成的學者，早已有研究方法的自覺，以台灣古典文學研究界的四位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學者為例：江寶釵在1999年於《台灣古典詩面面觀》便吸收西方文學理論之長，以「作者、宇宙、作品與讀者」深入探究，循序漸進的分析台灣古典詩中作者階層與創作表現的關係，以及台灣古典詩所反映的自然與社會等；^[2]黃美娥在1999年《清代台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則早就提出：「區域性」

[1] 許俊雅主編，《講座FORMOSA——台灣古典文學評論合集》（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4），頁644-669。

[2] 江寶釵，《台灣古典詩面面觀》（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9），頁8-13。

的文學研究將是未來台灣文學研究可以期待的新方向^[3]；施懿琳在2000年的《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的〈緒論〉之中，對於台灣古典文學研究的未來則提出四個重點：「基礎工作亟待進行」、「研究面向全幅而多元的開展」、「必須擺脫窠臼，具問題意識與方法上的自覺」、「必須將台灣古典文學研究放在世界性的格局中思考與觀察」^[4]；許俊雅在2004年的〈九〇年代台灣古典文學研究現況評介與反思〉則強調了：還原文學創作時的歷史情境、史料的廣泛運用（諸如外文史料、族譜、碑碣文獻、口述歷史資料等）、適當的吸收西方文學理論等^[5]。這些論述可謂「要把金針度與人」，不只呈顯台灣古典文學研究的專家學者對於研究方法的自覺性提升與研究領域的積極性拓展，且對於台灣古典文學研究的研究的後進者而言極有助益。

筆者也認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者對於作品內容深入考證之精神、廣泛參照相關歷史文獻的手法，同樣值得借鑑。中國的台灣文學研究者汪毅夫便曾坦白的以本身為例說道：他在編寫《台灣文學史·近代文學編》的過程中，對於劉家謀的敘述有兩處錯誤，一是從包恆新《台灣知識辭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接受了劉家謀來台是擔任「台灣府學教諭」這樣的錯誤，其實應該是「台灣府學訓導」才對；另外，他原本根據《清代福建鄉會硃卷齒錄彙存》而誤將劉家謀的生年訂在1915年，後來又參考了朱彭春《安樂康平室隨筆》（北京：中華書局，1982）才知道應該是1814年才正確^[6]，汪毅夫藉此而強調歷史文獻考證對於文學史論述的重要性。的確如此，而筆者在碩士論文《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研究》（中壢：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2004）完成之後，仍有意猶未盡之感，覺得關於這位詩人及其詩作，尚有討論的空間，期待藉本論文之分析而窺知陳肇興的詩歌藝術創作手法、詩中表現的個人悲歡離合、所反映的歷史社會背景以及敘述與評論時事當時所透露的意識型態，並且作為與其他相關論述

[3] 黃美娥，《清代台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台北：輔仁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1999），頁9。

[4] 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頁15-16。

[5] 許俊雅主編，前引書，頁629-643。

[6] 汪毅夫，〈《台灣詩史》辨誤舉隅〉，《福建論壇》，1994.04，頁80。

的對話中介，並探討透過「微觀」、「細讀」的方式以及廣泛歷史文獻對於文學作品解析的重要性。而此亦為筆者碩士論文《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研究》研究方向與成果的進一步發展與延續。

一、陳肇興、「萬生反」與《陶村詩稿》

南北朝詩評家鍾嶸在其《詩品·序》中闡述詩人的創作動機主要有兩方面：其一是關於大自然的景物：「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台灣在19世紀中葉（道咸年間）之前的詩壇以「遊宦詩人」為大宗，其主題著重在台灣獨特的山川草木、鳥獸蟲魚等，正屬於這方面；其二，讓詩人「感蕩心靈」的是人際社會的種種現象：「嘉會寄詩以親，離群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台灣於19世紀中葉之後，在地詩人逐漸佔有重要地位，關於此方面的作品乃日漸增多，詩歌中反應了當時的社會現實，並藉此批判時局，發表個人看法^[7]——彰化詩人陳肇興（1831-1866？）^[8]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陳氏字伯康，號陶村，彰化縣城（今彰化市）人。1859年（咸豐9年）方屆28歲就高中舉人，榮歸故里。1862年（同治元年）至1864年之間親身經歷戴潮春事變（民間或稱「萬生反」、「紅旗反」，官方簡稱為「戴案」），他將其間種種經歷皆以詩記之，傷時感事，情意真摯，更具有頗高的史料價值，因此獲得「詩史」、「小杜甫」之稱，^[9]著有《陶村詩稿》8卷，所存作品數量最多的就是作於戴案期間的末兩卷。《舊唐書》形容杜甫

[7] 此前後期之分別，參考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前引書，頁3-4；而台灣在清領時期的第一位進士，也就是有「開台進士」之稱的鄭用錫（1788-1858），是在道光3年（1823年）登科的，此亦可視為台灣漢文化發展情況的指標之一，足為佐證。

[8] 關於陳肇興卒年的考訂，主要利用吳德功，《彰化節孝冊》（台北：大通書局），1987。可參閱筆者拙著，《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研究》（中壢：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32-45。

[9] 台灣新本土社，〈台灣新本土主義宣言〉，《台灣e文藝》1期，2001.02，頁40。

詩作的成就與特徵有三：分別是「善陳時事」、「律切精深」以及「至千言不少衰」；這三點用在陳肇興身上卻也若合符節，尤其是「善陳時事」（擅長寫實性的敘事詩）與「至千言不少衰」（能做長篇鋪陳）兩方面，在四百餘年來的台灣古典詩史上，實在是少見的佼佼者。無怪乎日人尾崎秀貞（1874-1949，曾任台灣總督府聘任台灣史料編纂員）會說：「在我讀了《陶村詩稿》之後，才認識到在一百多年前的台灣中部的陳陶村是多麼優秀的一位詩人！」，^[10]讚譽欽服之情，溢於言詞之間。

吾台在清領時期素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之稱，對於貪官污吏以及政府的不當措施，往往奮而起身對抗，甚至揭竿而起，「雖九死其猶未悔」，^[11]成為台灣人勇於向不公不義對抗的歷史傳統，尤其以古彰化縣地區（約為今中彰投三縣）為最——台灣三大民變當中，除了朱一貴事件起於高雄岡山之外，另外二起（林爽文事件、戴潮春事件）都起自此地區。彰化文學亦有此反抗精神之特色，由陳肇興、洪棄生、賴和、楊守愚、洪醒夫、林雙不到宋澤萊皆然，都能不畏各種強權，為社會上的弱勢發聲，正所謂「磺溪精神」傳統之表現。^[12]

本文便嘗試分析此一產自最具有抗暴精神的地區、台灣清代古典詩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寫實詩人陳肇興、在最大規模的民變（或可說是「內戰」）裡，如煙火一般迸發出來的精彩詩歌作品。目前已有許多文史學界的專家曾經或多或少、或繁或簡的討論過此一議題，例如吳蕤、施懿琳、連慧珠、龔顯宗、林翠鳳等人，其內容有的採用宏觀（macro-view）式的全景概述；有的與其他同樣經歷戴案的詩人進行提要式的比較；有的深入整理考證其歷史背景資料，對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之研究皆有所貢獻。但是，其中對於某些特定議題仍頗有齟齬矛盾之處（詳後文），也仍有不少詩作反應的史實未被點明。筆者認為：此一台灣古典詩史上頗具重要性的詩人作品，應該可以再進行較為「微觀」

[10] 尾崎秀貞，〈清朝時代の台灣文化〉，收錄於《台灣文化史說》（台北：台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1931）頁102。

[11] 語出屈原〈離騷〉。

[12] 王燈案，《磺溪一老人》（彰化：自版，1980），頁9；康原，《尋找彰化平原》（台北：常民文化，1998），頁46-48；莊永明，〈磺溪精神的化身〉，收錄於氏著《台灣紀事》（台北：時報文化，1989），頁796-797。

（**micro-view**）式的細部分析，並且試圖解決一些重要的議題（例如台灣古典詩人的階級特性是否完全框限其創作思想等）。本論文便以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作為基礎，並且參酌借鑒西方文學理論，進行統整爬梳以及更深層的探討。

《陶村詩稿》的創作時期從1852年（咸豐2年）至1863年（同治2年）總共12年，雖然戴案僅佔了其中的末兩年（約17%），但是詩作數量卻有172首，比例高達全部的35%，可見本文論述焦點的戴案期間詩作確實是該詩稿中的重頭戲所在；至於為何要針對「初期」的作品呢？第一、回顧目前相關研究成果，發現各家主要都集中於事變中後期的詩作，關於初期詩作，未有令人滿意的較為深入之論述；第二、陳肇興在戴案的中期與後期，所創作的主題大多是四處征戰與逃難的過程，但是前期詩作相較之下則有較高的多樣性：戰亂前夕的憂心忡忡與力挽狂瀾、彰化城破而身處山村的驚詫莫名與茫然無助、與家人團聚的喜極而泣、暫時安居的閒適恬淡、對官軍出面彈壓的熱切期待……等等，隨著事件發展而高潮迭起、扣人心弦，與中後期詩作充滿壯烈悲涼、殘忍肅殺的氛圍大不相同，頗具代表性，且值得深入探究。

值是之故，筆者決定就選擇陳肇興在亂事爆發前夕一直到他起意暗殺戴潮春之前這段時間（即為戴案初期）內的46首詩歌作為論述範圍（從〈春日有感〉一直到〈日暮遠眺〉），正如《呂氏春秋·察今》所云：「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鱉之藏也；嘗一脔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由這四十餘首詩作，亦可看出許多值得探討的問題。

在進行論述之前，有必要大略敘述「萬生反」的前因後果。此事變主角戴潮春（？～1863），字萬生，是彰化縣四張犁（今台中市北屯區內）人，家中頗有資產。因為有田租被阿罩霧（筆者故鄉，即今台中縣霧峰鄉）林家所侵佔，但戴姓在四張犁只是小姓，不像其他諸如霧峰林姓、社頭蕭姓、鹿港施姓等都是中部各地的巨姓大族，因此他便組織一非血緣關係的社會互助組織「八卦會」（即「天地會」被當局禁止之後所改名者），彼此援助，壯大聲勢。當時清廷正與太平天國打得焦頭爛額，乃鼓勵地

方興辦鄉勇團練（曾國藩湘軍亦屬之），代替正規軍來維持地方安靖；戴氏便以八卦會的人脈籌辦鄉勇團練，剛開始頗為地方官所倚重，沒想到後來因為發展過盛，參與份子複雜，反而騷擾地方人民，也引起官方側目猜疑。1862年台灣兵備道（當時台灣職級最高的文官）孔昭慈便由府城北上彰化懲辦，採用殺雞儆猴的方式，到達彰化就立即把會黨一名領導人物洪姓總理（地方重要鄉治組織的首長）執斬；又調派個性剛硬的淡水同知秋曰覲來嚴厲查辦，終於因此激起民變——秋曰覲在討伐會黨勢力途中，因為他調集來協助戰事的地方團練領袖林日晟（人稱「戇虎晟」）反戈相向而被殺；會黨武力乃順勢攻下彰化縣城，在香煙繚繞、鑼鼓喧天之中，迎戴潮春入城。

所謂「頭洗落去，無剃鬚使」，四塊厝林日成與各地豪族乾脆集結武力，以「紅旗」為標誌，四處攻城掠地，聲勢頗壯。台灣總兵（當時台灣職級最高的武官）林向榮在斗六一役被圍困多時，終於因內部熟番士兵反戈而被戴軍所殺，官兵死傷慘重。剛卸任台灣知府的洪毓琛代理台灣道台，他為了籌餉事宜而焦急萬分，府城攻防戰更讓他心力交瘁，最後過勞而死。至此台灣文武高官「三巨頭」之道台、總兵、知府全部殉職，這是台灣清領時期大小民變中空前絕後的情形，戴軍兵勢之盛大由此可見。

不過，後來因為各地科舉社群與地主富農等地方領導階層組織鄉勇抵抗，^[13]導致戰況陷入僵持：戴軍往北無法穩定佔有進攻竹塹的前哨站——大甲（曾一度攻下，又被竹塹的官民聯軍奪回），往南也攻不下進軍府城的跳板——嘉義。然而，清廷陸續派出總兵曾玉明、水師提督吳鴻源、副將曾元福率兵數千渡台，也都不痛不癢，沒什麼效果。直到1863年（同治2年）由通曉台灣民情的前淡水同知、新任台灣道丁曰健與出身霧峰而對中部情勢瞭若指掌之陸路提督林文察先後率兵抵台，統合各地民間武裝集團（如林占梅領導的兵勇），終於把戴軍各股勢力攻破，戴潮春被捕不屈，慷慨就戮。各地戴軍倖存勢力仍然堅強抵抗，從事發之

[13] 如林占梅扼守大甲溪、蔡德芳協守鹿港、林鳳池與陳肇興、簡化成在南投縣境聯合抵抗戴軍等。

後，總共歷時三年左右才逐一被鎮壓下去^[14]。

陳肇興說起來與戴潮春是舊識，恐怕還頗有交情，令人頗感奇怪的是此點似乎仍未有其他學者指明。主要證據有以下三點：

第一、陳氏1854年有詩〈董濟亭夫子壽言〉，1863年也作有〈哭董濟亭夫子〉，很明顯的表明他是歲貢生董大經（濟亭為其字號）的學生；而戴潮春恰巧早年也曾經拜董氏為塾師，^[15]兩人有同門之誼。

第二、陳肇興曾經在今北屯文昌廟址任教，而戴潮春故宅就在附近，^[16]戴氏在當地亦屬有頭有臉的大人物，自祖父以降就是書香門第，三代都在彰化縣城從事文書工作，^[17]祖父還曾捐錢修建彰化孔廟，^[18]戴氏本人更是風度翩翩、一表人才，^[19]戴案事發當時，他是年屆古稀的長者，地方上都尊稱他為「總理伯」，頗受敬重，^[20]陳戴兩人可能在北屯就有過頻繁的互動。

第三，戴潮春曾任北路協稿識，根據《彰化縣志》所附〈彰化縣城圖〉顯示，該官署就位於彰化城內白沙書院、學署與孔廟的旁邊，而這三者都是陳肇興的重要活動地點：他曾在孔廟旁的

[14] 以上關於戴案之歷程，參考吳德功，《戴施兩案紀略》（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2），1-93；蔡青筠，《戴案紀略》（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7）；林豪，《東瀛紀事》（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7）；劉妮玲，《清代台灣民變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所，1983），頁141-150；謝國興，《官逼民反：清代台灣三大民變》（台北：自立晚報，1993），頁90-112；羅士傑，《清代台灣的地方菁英與地方社會——以同治年間的戴潮春事件為討論中心（1862-1868）》（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學所碩士論文，2000）。

[15] 林豪，《東瀛紀事》，前引書，頁58。

[16] 2003年12月筆者訪談北屯文昌廟耆老陳得文、陳有三老先生得知。

[17] 其實戴潮春的背景與《水滸傳》中的宋江或晁蓋頗為類似，三人都是擔任官僚體系的下層人員：宋為「押司」，晁為「保正」，而戴為「北路協稿識」；而三人都與江湖上的兄弟有密切往來。他們可說皆為橫跨黑白兩道的人物，一方面了解官僚體系運作而略通文墨，一方面具有廣闊的人脈且有領袖魅力，這些都是支持他們抗官起事的充分條件。

[18] 周璽等編，《彰化縣志》（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3），頁261；吳德功，前引書，頁55；北屯公學校編《大屯郡北屯鄉土誌》（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頁33；黃富三《霧峰林家的興起》（台北：自立晚報，1987），頁214。

[19] 「戴萬生者，住彰邑，素讀書，美豐儀，家小康」，見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嘉義管內採訪冊》（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4），頁8。

[20] 怪我氏，《百年見聞肚皮集》（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5），頁117。

白沙書院受教，尚未中舉之前又是學署的「彰化縣學生」，他的故居更是在孔廟一帶，^[21]總之，當戴潮春在彰邑供職時，兩人互動的機會也不少。或許正因為兩人曾經有過密切的互動，而這位年長的同門師兄「總理伯」竟然會起兵造反，乃大出陳肇興意料之外，所以他在事發之後，才會不禁大嘆「半生輕結客，此日愧知人」（〈山居漫興〉）了！戴案不只深深的影響陳肇興的人生經歷以及創作內容，也對他產生很大的衝擊。

《陶村詩稿》當中關於戴案之詩作，全部集中在末兩卷，起始於「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春日有感〉，而以歸鄉之後所作的〈哭房師潘瑤圃夫子〉一詩殿後，或有以為繫年於1861年的〈前從軍行〉與〈後從軍行〉也屬於此一主題，^[22]其實那兩首詩是詩人哀憐台人渡海前去參與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的軍事活動所作，當時戴案猶未爆發也。本文論述範圍內的「戴案初期」詩作總共有以下諸首：〈春日有感〉、〈北投埔義士宴集倚南軒計議防亂事宜即席賦贈〉、〈三月十六日奉憲命往南北投聯莊遇亂避居牛牯嶺即事述懷〉（4首）、〈十八日秋雁臣司馬殉節大墩〉、〈二十日彰化城陷〉、〈孔觀察殉節詩〉（2首）、〈鈕貳尹殉節詩〉、〈城破喜二弟挈家眷至〉（2首）、〈詠懷〉（5首）、〈山居漫興〉（8首）、〈端午飲家與三茂才舍中聞大軍登岸口占示喜〉、〈消夏雜詩〉（14首）、〈夏日偶成〉、〈七夕示內〉、〈雨後溪上望月〉、〈柴關〉、〈日暮晚眺〉，總共有18題、47首，以下便依照各首詩歌繫年的順序逐一論述，分為〈聯莊防亂，烽火倏起〉、〈哀悼殉職官員：秋曰觀、孔昭慈與鈕成標〉、〈寄居山村賦〈詠懷〉〉、〈山居漫興以遣悶，王師登岸而誌喜〉、〈歌詠鄉野美景，期盼早日還鄉〉與〈結論〉等六個章節。

[21] 其故居舊址應在今彰化市民生路195巷一帶，見林翠鳳，《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之研究》（台中：弘祥出版社，1999），頁47-48；顧敏耀，前引書，頁71。

[22] 見施懿琳選編，《國民文選·傳統漢詩卷》（台北：玉山社，2004），頁173。該文賞析〈三月十六日，奉憲命往南北投聯莊遇亂，避居牛牯嶺，即事述懷〉（其四）說道：「戴潮春起事的第一年，陳肇興模仿杜甫〈前、後出塞〉寫下了〈前、後從軍行〉……」，應屬一時不察致誤。

二、聯莊防亂，烽火倏起

陳肇興在戴案將起未起的1862年（同治元年）年初，或因其較為貼近人民生活，深體民情，乃能洞燭機先，預感大亂將起，而寫下〈春日有感〉一詩：

咄咄緣何事，傷心獨倚欄。十年回首處，萬感上眉端。燕雀巢雖穩；豺狼馭尚難。憂天空涕泣，無力障狂瀾。

詩中運用兩個典故，一是「書空咄咄」，語出《晉書·殷浩傳》：「浩雖被黜放，口無怨言，九神委命，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其次，「燕雀巢雖穩」乃運用「燕雀處屋」之典故，比喻居安而不知危，毫無警戒之心，語出《孔叢子·論勢》：「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煦煦焉其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灶突決上，棟宇將焚，燕雀顏色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己也」，由此可知他雖然已經看出端倪，不過獨木難支大廈，充滿著無力感，而此類心情時常浮現在作者於戴案期間的詩作之中。

陳肇興雖然對於局勢倍感無奈，但是仍然力圖挽救局勢。在彰化被戴軍攻下的前一個月左右，局勢已經紛紛擾擾的十分不平靜了；詩人還前往草屯（舊稱「北投」，與台北的「北投」同名）與當地科舉社群以及各大姓（主要應即草屯四大姓：洪李林簡）的族長商議如何面對即將來臨的變局，他在席間作有〈北投埔義士林錫爵招同林文翰舍人、邱石莊、簡榮卿孝廉、洪玉崑明經及各巨姓頭人宴集倚南軒，計議防亂事宜，即席賦贈〉一詩：

壬戌二月二十二，春風習習花明媚。林逋折東開華筵，一縣名流今日聚。是時四野盡成狂，燒香作會等兒戲。紛紛肉食不知謀，但坐高堂唯臥治。君子防患貴未萌，杞人憂天在無事。九十九峰夕照黃，對此茫茫百憂至。金陵烽火達錢塘，徵召年年來驛使。酖毒由來生宴安，太平焉可忘武備？人生浩氣秉乾坤，報國何須權與位！但教友助循古風，自保一方即忠義。諸公矯矯人中豪，綢繆未雨真高誼。愧我雕蟲非壯夫，才弱不堪供指臂。因君慷慨發悲歌，把酒勸君且一醉。樹頭喔喔晨雞鳴，為君起舞別君去。

詩中記錄了兩方強烈的對比：一是當時民間熱烈踴躍參與八卦會的情形，另一面卻是無所事事而無法防範未然的清帝國官員。詩人於此運用「臥治」之典故——西漢的汲黯崇尚黃老之術，治官理民好清靜無為，抓大事而不究小節。任東海太守時，因多病臥閣內不出，東海卻大治。後漢武帝詔為淮陽太守，淮陽亦大治（《史記·汲黯列傳》）。後遂以「臥治」比喻為政有方，不勞而治；但是此處則飽含著諷刺的意味。詩中接著說明因為台灣的地方武力很多都徵調去跟太平天國打仗了（主要指霧峰林文察的部隊），地方守備十分空虛，因此中部地區的領導階層只好自力救濟穩定地方情勢，陳氏記載了當時他們達成的協議就是「自保一方」，雖不主動攻擊戴軍，卻也要壓抑地方人民參與會黨，讓戴軍勢力不至於持續擴大。詩末的「喔喔雞鳴」則隱含著兩層意思，其一是祖逖「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晉書·祖逖列傳》）的典故，另外則是「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詩經·鄭風·風雨》）之意，亦即顧炎武所說的「松柏後凋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日知錄·廉恥》）。詩人殆以祖逖「聞雞起舞」以及「風雨雞鳴」之精神來自勉。

1862年的三月，早已「山雨欲來風滿樓」了，台灣道孔昭慈於三月初九抵達彰化查辦。當時必定有許多事務分頭進行，除了由淡水同知秋曰覲率領主力部隊前往八卦會勢力範圍彈壓之外；與南投地區有淵源的彰化舉人陳肇興也領受道台之命^[23]到該地區辦理「聯莊」事宜，至於所謂「聯莊」又稱「聯甲」，即是「存保甲之共同防盜、捕盜之職責，以小莊附諸大莊」，^[24]事實上包含了「清莊」與「聯甲」兩項功能：「夫清莊者，嚴事稽查，不

[23] 林翠鳳云：「此處所謂的『長官』、『憲命』所指為何？作者並未明確指出，後人也無由定說，然而應當是清廷政府官長無疑」（見氏著，前引書，頁59），「憲」確實是舊時用以尊稱政府機構長官者，例如稱道台為「道憲」、布政使為「撫憲」、按察使為「臬憲」、知府為「府憲」等，然而當時最有可能頒予「憲命」給陳肇興者，即是在彰化縣城統籌指揮的台灣道台孔昭慈（其他官憲皆無可能）；另一佐證為陳氏在〈三月十六日，奉憲命往南北投聯莊遇亂，避居牛牯嶺，即事述懷〉中稱讚此官憲乃本身之「知己」（「生平感知己」）而後來的〈孔觀察殉節詩〉同樣說：「招魂感知己」，更令人確定當時的「憲命」即「道憲」之命也。

[24] 戴炎輝，《清代台灣之鄉治》（台北：聯經，1998），頁252。

使內賊之匿；聯甲者，互相防守，不使外賊之來也」。^[25]陳肇興於是帶著道台的命令，前往聯繫南投地區的街莊總理、地方頭人建立民間防禦體系。當時他的家人都還住在彰化城內，只有其隻身一人前去洽公。

結果，出乎意料之外的，就在他到達的那天傍晚，一起與當地父老參詳聯莊事宜後，寧靜的夜晚突然人聲鼎沸、烽火四起，台灣史上歷時最久的民變「萬生反」正式爆發了！這段關鍵時刻，他以五言古詩〈三月十六日，奉憲命往南北投聯莊遇亂，避居牛牯嶺，即事述懷〉（共四首）記錄了關鍵數天內的心情：首篇作品創作於戴案爆發之前，陳肇興在詩中以弦高、荊軻自我期許——在此運用「荊軻易水送別」之典，蓋已抱著「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心情，懷著青年士子為國為民的胸懷、鄉紳對地方上的責任感，而深入虎穴，慨然前往：

倉皇辭長官，低徊別妻子。豈不懷艱虞，生平感知己。弦高犒秦師，荊軻度易水；緬彼市井兒，樹立乃如此。矧我七尺軀，家國交相倚。乘茲鼎沸時，抽薪猶及止。峨峨芟茗山，北望暮雲紫。仰視黃鵠飛，一舉翔千里。加鞭策騫駘，我行殊未已。（其一）

本詩末句「殊」者「尚」也；「我行殊未已」者，其實隱含著「任重而道遠」之深意，整篇有股奮發樂觀、滿懷希望之情。不過，第二首則作於到達該地投宿之夜，因戴案倏然爆發而心情為之一變：

薄暮投山莊，杯酒互相慶。父老三五人，問名半同姓。艱難出簡書，慷慨論王命。愧非守土官，棲棲毋乃佞。一炊而百揚，眾寡常不勝。夜來聞笳聲，烽火四山應。抬頭望鄉關，旌旗蔽巖磴。流涕寂無言，俯首看刀柄。（其二）

由於兵戈猝發，使詩人措手不及，心中極度驚詫、愕然，望向彰化城，又只見戰旗如雲，憂念家鄉老母、妻兒、兄弟等親人生死未卜；更預見這場戰事必定掀起一場腥風血雨，手中緊緊握著刀柄卻不禁「獨愴然而涕下」。接著在第三首的內容顯示詩人當時

[25] 姚瑩《中復堂選集》（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4），頁40。

已經無法在該處繼續借宿了，轉而在附近山林原野中四處流浪：

刀柄鐵環環，摩挲日三百。攜將滄海去，邂逅孫賓石。曠
野夕悲風，陰雲悽以黑。慷慨發高歌，白雲為之匿。采薇
供夕餐，拾橡充朝食。悽愴杜陵叟，流離遼海客。家鄉在
何處，遠望淚沾臆。（其三）

詩人很妥切的運用了一則西漢之歷史典故——名儒趙岐早年因為處世剛正不阿，觸怒權貴，為了躲避追殺，隱匿姓名而四處逃匿，後來流落到北海郡的市場裡去賣餅。某一天，當地士族孫嵩看到他，深覺氣質非凡，乃停下來邀他登車。趙岐以為事跡敗露，大驚失色，這時，孫嵩放下馬車的帷幕，摒去閒雜人等，告訴趙岐說：「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孰能相濟！」趙岐原先就聽過對方之盛名，乃據實以告。孫嵩便帶著趙岐回到家中，秉告母親，迎入大廳，以豐盛饗宴熱情款待。而後把趙岐藏匿在複壁之內，讓他安心度過風聲鶴唳的那幾年。^[26]陳肇興當時會發出「攜將滄海去，邂逅孫賓石」之語，想必因為四周人物的立場都與其相左，也就是說附近都已經成為八卦會的勢力範圍了！（也正因此而使他被迫必須離開原本借宿之處而四處流浪），當時無處藏身的處境，使其內心不禁希求有一位正義之士能夠慧眼識英雄，就像西漢的孫嵩懷著正義感來藏匿趙岐一般的來收留他。史書上記載趙岐曾作〈扈屯歌〉23章，記錄了他艱辛備嘗的逃難歷程，可惜並未流傳下來；其實，《陶村詩稿》末兩卷何嘗不可視為台灣古典詩史上的〈扈屯歌〉呢？

另外，前引詩中還暗用三則典故：其一為「拾橡」與「杜陵叟」，語出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其一）〉之「歲拾橡栗隨狙公」；其二是「采薇」，此一「能指」（signifie）有兩個可能的聯想對應「所指」（signifiant），一是《史記·伯夷列傳》：「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二是《詩經·小雅·采薇》，〈詩序〉云：「〈采薇〉，遣戍役也」，乃描述戰亂造成的苦難。陳肇興在詩中描述自己流落山野，「采薇供夕

[26] 見《後漢書·趙岐列傳》。

餐」，主要是將自己類比伯夷叔齊在山中採食野菜의 飢餓經歷，其次又隱含著自己是因為戰亂而導致如此流離失所之意。至於「流離遼海客」之典，指的是西漢末年的管寧：「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原（耀按：指邴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遼東」（見《三國志·魏書·管寧列傳》），詩人身處生平遇到的最大戰亂，這對他來說，就如同管寧當時所面對的「天下大亂」一般。

接著在第四首詩作中，陳肇興表明心跡，說明自己僅是一介文人，在兵馬倥傯之際，整個彰化城亂紛紛之時，他實在不能自投羅網的回去城內營救家人。而兩地消息未通，使他只能詢問從彰化城逃離的民眾：

牛^[27]山一回首，百里塵茫茫。有客從北來，相逢歧路傍。
牽裾引之近，急問弟與娘。客言：「賊如毛，揭竿萬萬行。紅旗蔽白日，刀戟相低昂。前頭載婦女，後頭括金璫。殺人但聞聲，烏能審其詳！」三問不吾對，涕泗沾衣裳。（其四）

對方說起戴軍除了載走金錢之外，還擄走婦女，甚至殺人不眨眼。一問之下讓他更加緊張，頓時如熱鍋上的螞蟻，深感徬徨無助之下，再次潸然流淚。而此詩也記載在事起當時，八卦會眾早就已經採用「紅旗」作為標誌了。

三、哀悼殉職官員：秋曰觀、孔昭慈與鈕成標

八卦會眾正式發難之後，前線的戰情快報透過口耳相傳的小眾傳播，逐一傳到詩人所在的牛牯嶺一帶（即「牛牯嶺大庄」，或簡稱「大庄」，現南投縣名間鄉大庄、南大二村）。詩人陸續聽到文武官員被殺戮的消息，他作有三首詩作以悼念之，其一是〈十八日，秋雁臣司馬殉節大墩〉：

越境偏將死事勤，英雄肝膽迥超群。威行虎豹聲如震，血

[27] 各版本都誤作「牛山」，鄭喜夫纂訂之《陶村詩稿全集》（台中：台灣省文獻會，1978）亦未予以校正。應作「牛山」才是，意即「牛牯嶺」也。陳肇興〈自許厝寮避賊至集集內山次少陵「北征」韻〉詩中也有說：「有弟滯牛山，多時悲契闊」，亦可作為佐證。

灑郊原氣奪雲。殺賊猶期為厲鬼，斷頭還不到將軍。九重
他日逢褒卹，青史千年姓氏芬。

「秋雁臣司馬」即淡水同知秋曰觀，浙江山陰人，副貢，咸豐8年（1858）曾短暫署任此職，咸豐11年（1861）再署，直至此時（1862年）殉職。^[28]詩中「越境」者，也就是現在所謂「越區辦案」，因為秋氏當時是淡水同知，管轄大甲溪以北的區域，只因他曾任彰化知縣，頗具威名（由詩中用「威行虎豹聲如震」來形容他，其性格不言可喻），孔昭慈因此命其南下彈壓，不料「出師未捷身先死」。陳肇興在這首詩中，通篇對秋曰觀大加褒揚，不僅稱其為「英雄」，且說他必定會萬古流芳、留名青史。第二篇哀悼詩作是〈孔觀察殉節詩〉兩首：

獨闢盈廷議，提師出海東。千秋存大節，一死表孤忠。罵
賊皆皆裂^[29]，憂民淚未終。炎荒崩砥柱，何處不沙蟲^[30]！
（其一）

不把科名鬻，清修絕代無。五年持玉尺^[31]，一網盡珊瑚^[32]。
洙泗^[33]淵源遠，乾坤節義孤。招魂感知己，剪紙^[34]幾遽呼。
（其二）

「孔觀察」即孔昭慈，字雲鶴，山東曲阜人，道光15年（1835年）進士。來台任鹿港海防同知、台灣知府，於咸豐8年（1858）升任台灣兵備道^[35]。因為台灣道又兼學政，主持歲考、

[28] 國內與秋氏相關的古蹟文物，筆者搜索到有台中東勢先師廟內「欽加府銜字雁臣諱曰觀秋老大人祿位」，可見其為當時修建廟宇有出錢出力者。

[29] 《舊唐書·張巡列傳》：「巡神氣慷慨，每與賊戰，大呼誓師，皆裂血流，齒牙皆碎」。

[30] 「沙蟲」是陳肇興詩中出現多次的典故，出處是《太平御覽·羽族部三·鶴》引《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蟲為沙」，故以「沙蟲」指稱戰死沙場。

[31] 「玉尺」指嚴謹的測試取才。語本李白〈上清寶鼎詩〉：「仙人持玉尺，廢君多少才」。

[32] 比喻網羅人才。《新唐書·西域傳下·拂菻傳》：「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舶墮鐵網水底。珊瑚初生磐石上，白如菌，一歲而黃，三歲赤，枝格交錯，高三四尺。鐵發其根，繫網舶上，絞而出之」。

[33] 「洙泗」乃孔子故鄉曲阜附近的兩條河流名稱，此處用以代稱孔子。

[34] 杜甫，〈彭衙行〉：「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剪紙招魂為中國南方習俗。

[35] 宗稷辰撰，〈孔雲鶴墓志銘〉，收錄於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續碑傳選集》（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4），頁98。

科考，有為國舉才之責，故云「持玉尺」、「網珊瑚」云云。有歷史學者解析此詩云：

孔昭慈之所以能把（耀按：「把」為衍文）「不把科名鬻」，大抵是素行強幹的秋曰覲力以辦賊自任，而致水漲船高使孔昭慈得此「清修絕代無」之美名，否則以當時之情勢與孔昭慈個人的作為而論，恐亦無法使其作此矜持。^[36]

這段話頗值得商榷：孔氏「不把科名鬻」指的是他公正主掌基層科舉之事，這與其下屬秋曰覲何干？難道是誤將此句理解作孔昭慈在戴案期間的作為？此外，何以說他「力以辦賊自任」就能夠讓孔氏「水漲船高」？這段話恐怕是歷史學者對於文學作品的用字遣詞、典故運用以及篇章含意了解未深所造成的錯誤解讀。

再回過頭來繼續看肇興這首詩作，他詩中除了稱揚孔道台在科舉考試十分公正之外，亦讚許他能夠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但卻僅僅說孔昭慈「一死表孤忠」，而不像後來描述一些戰死的官員如林向榮為「馬革屍空裹」、王國忠是「血自披肝瀝」以及顏常春「千秋留碧血」（詳後文）等等，對孔氏的死亡彷彿沒有較為激烈的描寫，因此，所謂「一死」者，是否即為指涉「自盡」之意？但是，詩中又說他「罵賊皆皆裂」，彷彿曾經與戴軍有過激烈戰鬥，那是否是征戰中為敵軍所殺？詩人此處描述頗為模稜兩可，又無詩序、自註以解釋之，其實，在其他文獻資料的記載當中也略有出入，說是服毒自殺者較多：閩浙總督的慶端1862年6月奏道：「二十日黎明縣城失陷，孔昭慈巷戰受傷，旋即仰藥殞命」，^[37]但是林豪對孔道之死則記云：

孔道遣林日成時，幕友汪季銘力諫不聽。及被圍，復從問計，應曰：「賊首多漳屬人，城中漳多而泉少，且兵力單薄不可守也，乘賊未合，可糾親丁兵勇，奪門而出，退守鹿港，然後調兵規復，未為晚也」，又不聽。至是仍向汪

[36] 連慧珠，《「萬生反」——19世紀後期台灣民間文化之歷史觀察》（台中：東海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95），頁73。

[37] 見洪安全主編，《清宮月摺檔台灣史料》（台北：故宮博物院，1994），頁448。

問計，汪手書「朝聞道夕」四字示之，孔道點頭。是夕仰藥死。^[38]

較晚出的其他史料說法皆與林豪所記大同小異，如吳德功說：「孔道遲至數日，寄書問汪季銘。汪答以『朝聞道夕』四字，孔道即仰藥死」，^[39]蔡青筠則說：「當城圍之亟也，孔道見外援不至，寄書問汪季（耀按：原文誤作「李」）銘，汪答『朝聞道夕』四字；及城陷，孔歎曰：『施九挺誤我矣！』，仰藥死」；^[40]連橫說道：「昭慈被囚，猶問計於汪寶箴。寶箴復書曰：「朝聞道夕」，是夜即仰藥死」。^[41]〈墓誌銘〉也只記載他「盡節彰化城中文廟」，^[42]但被殺或自盡皆可說是「盡節」，頗為語焉不詳。至於《嘉義管內採訪冊》則說孔道並非仰藥身亡，乃「自縊而死」；^[43]民間文學作品方面，產生於東勢地區的〈新編戴萬生作反歌〉說：「四品孔道自縊死」，^[44]彰化地區流傳的〈辛酉一歌詩〉則說：「破了彰化未幾時，孔道台走^[45]到蕃薯寮，^[46]吞金來身死」，^[47]另有流傳於南部的〈相龍年一歌詩〉則說：「壹下殺、貳下殺，天地多未平，孔道台頭殼作二平」，^[48]竟說孔昭慈是被會眾用刀將頭批成兩半而死；台灣總兵曾元福於1864年3月的奏摺裡則記載著：「同日（耀按：即該年3月30日）

[38] 林豪，《東瀛紀事》，前引書，頁5-6。

[39] 吳德功，《戴施兩案紀略》，前引書，頁7。

[40] 蔡青筠，《戴案紀略》，前引書，頁6。

[41] 連橫，《台灣通史》（台北：大通書局，1987），頁884。

[42] 宗稷辰撰，〈孔雲鶴墓志銘〉，同前引文，頁98。

[43] 見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嘉義管內採訪冊》，前引書，頁45。

[44] 不著撰人，〈新編戴萬生作反歌〉，收錄於連慧珠，《「萬生反」—19世紀後期台灣民間文化之歷史觀察》，前引書，頁144。

[45] 「走」在福佬話中，乃「奔跑」之意，不同於現代白話中的「行走」，而與古漢語用法相同。

[46] 經查陳正祥，《台灣地名辭典》（台北：南天，1993）、台灣總督府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調製，《台灣堡圖》（台北：遠流，1996）以及洪敏麟《台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下》（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等書，全台名為「蕃薯寮」（「蕃」或作「番」）者，僅有三處：一是今高雄縣旗山鎮舊名，一在宜蘭縣頭城鄉，一在台北縣新店市，中部未有名為「蕃薯寮」者，待考。

[47] 楊清池，〈辛酉一歌詩〉（二），《台灣新文學》1卷9號，1936.11，頁65。

[48] 丁鳳珍，《「歌仔冊」中的台灣歷史詮釋——以張丙、戴潮春起義事件敘事歌為研究對象》（東海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5），頁637。

拏獲上年首先謀害原任道臣孔昭慈要犯王冬，訊明凌遲」。^[49]統整前引眾多資料，〈墓誌銘〉以及其他文人撰寫的資料可能都沿襲「為死者諱」的傳統，而有粉飾編造的可能，有的資料產生於距離事發地點較遠之處（如林豪身處北部、〈相龍年一歌詩〉輾轉流傳在南部），亦頗有誤傳之可能。〈辛酉一歌詩〉以及曾元福之奏摺似有較高可信度，前者是極有可能曾經參與戴軍的底層人民所傳唱，後者是出身行伍的武將（可能比較不擅文人婉曲修飾那套）所奏報，可信度較高，因此，陳肇興詩中所說的「千秋存大節，一死表孤忠。罵賊皆皆裂，憂民淚未終」，可能是指孔道從城中出逃，在蕃薯寮被王冬圍困逼迫，不得已而吞金自殺。

至於孔氏自盡的日期，根據〈墓誌銘〉記載是3月22日，當時孔氏家屬也有人在台，^[50]而且對於祭日的記錄，應該沒有造假的問題。該日乃城破之後第2天，可知陳肇興這首〈孔觀察殉節詩〉寫作日期必不早於該日。

除了秋曰觀與孔昭慈之外，陳肇興特地作詩悼念的第3位殉職官員則是鈕成標，題為〈鈕貳尹殉節詩〉：

死亦尋常事，如君浩氣存。但知危授命，不向虜求恩。篆卸忠尤盛，官卑節彌尊。荒陬思德政，涕泣遍山村。

「篆卸」者，當時鈕成標已經從「南投縣丞」捐升為「通判」了；^[51]「官卑」者，南投縣丞（尊稱為「貳尹」）在《清史稿·職官志》內記載僅是「正八品」，屬於基層官員。陳肇興讚嘆他能夠不屈而死，浩氣長存，此與其他文獻之記載相符——「南投縣丞鈕成標擄賊孔急，故賊擄之以見鄭玉麟，猶怒罵之，遂遇害」，^[52]不過詩人也記錄了當時牛牯嶺大庄一帶人民聽聞鈕氏受戮，為之慟哭的情形，若屬實情，則其在地地方之風評亦可窺知。以上三位人物在陳肇興詩中都是極為正面的形象，不過，再與其他文獻相對照之下，則產生或大或小的落差：首先是秋曰觀，在

[49] 見洪安全主編，《清宮月摺檔台灣史料》，前引書，頁645。

[50] 宗稷辰，〈孔雲鶴墓誌銘〉：「乃以彰化亂民不靖，危城猝陷，遂於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二日盡節彰化城中文廟；年六十有八」、「歿後斂殯歸喪，眷屬無損」，見氏撰前引文，頁98、99。

[51] 吳德功，《戴案紀略》，前引書，頁62。

[52] 同前註，頁7。

其他文本當中，雖也有同樣予以褒揚者，如怪我氏在《百年見聞肚皮集》形容秋曰觀：「為官廉明方正，材幹敢為，嚴厲約束衙門差役，不行貪污詐索民財，大得人心」^[53]；吳德功在1900年北上參加揚文會而寫下的《觀光日記》其中也有一條記云：

日晡，散步大墩街外，見新墳舊墳累累，因憶戴萬生亂秋雁臣司馬殉難於此，吟七絕以弔之：「此地當年舊戰場，登臨蒿目倍心傷。捐軀報國秋司馬，血濺荒坵草木香」。^[54]

詩中同樣對秋曰觀的戰死殉節有傷懷與褒揚之意。但是，大力抨擊秋曰觀者亦所在多有，如林豪說秋氏以為一味的強力彈壓就可收效，「自恃所能而不暇計其後，蓋勇敢有餘而好謀未足也」、「徒勇其可常恃耶！」；^[55]丁紹儀也指責秋氏只想學先前官員運用台地鄉勇以鎮壓民變的方式，結果反而一敗塗地，諷刺他是「無邯鄲之技，而第學其步！」，^[56]批評口氣十分嚴厲；連民間流傳的〈辛酉一歌詩〉也說：「秋大老死了未幾時，天頂落了二滴仔邇邇雨，百姓經體是置流眼屎」，^[57]「經體」應作「供體」，^[58]意指諷刺性的譬喻，可見人民對秋氏之戰死，實無憐憫之意，從而可推知當時民眾對他的觀感。

更具爭議性與指標性的則是關於孔昭慈個人。除了陳肇興詩作之外的文獻資料，有許多關於孔氏的負面記載，如吳德功批評孔昭慈「未經艱鉅，平昔只承流宣化，而蹈是弊」，^[59]這算是十分溫柔敦厚者，另外如林豪便歷數其多項缺失之後痛加抨擊：

以未嘗經事之書癡，而猝應地方之變故，其債事也宜哉。世有庸劣之流，胸無一策，貽誤蒼生，至於身攬世禍，求生不能，乃以一死塞責者，正未可因其死事之微，而寬其

[53] 怪我氏，《百年見聞肚皮集》，前引書，頁118。

[54] 吳德功，《觀光日記》，收錄於《台灣遊記》（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2），頁20。

[55] 林豪，《東瀛紀事》，前引書，頁68。

[56] 丁紹儀，《東瀛識略》（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7），頁96。

[57] 楊清池，〈辛酉一歌詩〉（一），《台灣新文學》1卷8號，1936.09，頁132。

[58] 胡鑫麟編著，《實用台語小字典》（台北：自立晚報，1994），頁220。

[59] 吳德功，《戴案紀略》，前引書，頁5。

誤事之罪也，噫！^[60]

文中認為孔氏之死談不上盡忠，只是被情勢所逼而不得然而已，甚至可以說是逃避責任、一死了之。蔡青筠更爆料說：

孔道雖仕台有年，然平日徵歌選色，未膺鉅艱；其所為形跡，故老類能言之。觀其用人之柄鑿，可見其識之昏庸。況乎全師盡出，曾無後顧，其敗也宜。^[61]

言語之間雖然已經十分保留（未道出「故老」所言為何），但是也毫不留情的抨擊，認為他辦事如此昏庸，當然一敗塗地，不值得同情。〈辛酉一歌詩〉云：「孔道台做官貪財利」、「要來剝削百姓錢」，^[62]形象也十分不堪。但是，並非只有陳肇興將孔氏刻畫為忠貞正直之形象，在官方文書中也可發現不少對他肯定性的敘述，如曾任台灣道的裕鐸於1853年上奏咸豐皇帝描述孔昭慈說「該員正直不苟，膽識兼優……尚屬奮勉急公，緩急可恃」，^[63]閩浙總督慶端與福建巡撫瑞璜也於1861年上奏說：「該員結實可靠，老練精明」，^[64]《清史稿》更說：「昭慈為政，興利剔弊不遺餘力」，還說他在彰邑自盡之後，「匪為歛殯歸喪，愧歎曰：『吾輩負孔使君矣！』」。^[65]

透過上述資料彙整，可以發現秋曰觀或孔昭慈兩人在其他文本的評價未必全然符合陳肇興詩中所形容的忠勇與清廉，施懿琳便說：「哪一個比較接近孔昭慈的本來面目？實是一耐人尋味的問題」，^[66]吳蕤則直接批評道「這位陳肇興先生是滿清士大夫人物一倫，當然也免不了對剿辦戴案的陣亡官吏，歌頌哀弔一番」，^[67]連慧珠甚至大加撻伐說：「陳肇興頌德如此，不免流於

[60] 林豪，《東瀛紀事》（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7），頁9。

[61] 蔡青筠，《戴案紀略》，前引書，頁4。

[62] 楊清池，〈辛酉一歌詩〉（一），前引文，頁127。

[63] 見洪安全主編，《清宮月摺檔台灣史料》，前引書，頁329。

[64] 同前註，頁439。

[65]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史稿台灣資料集輯》（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4），頁947-978。

[66] 施懿琳，《清代台灣詩所反應的漢人社會》（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1996），頁538。

[67] 吳蕤，〈戴潮春之亂與陳肇興的咄咄吟〉，《暢流》35卷4期，1967.04，頁3。

虛矯，足見亂世之中文士立言忠節，過於維護階級信仰，而與現實生活脫節」^[68]；另一方亦有林翠鳳為陳肇興打圓場說：當時很多城內官吏都隻身逃走或是見風轉舵，相較之下，「即是頗受非議的孔昭慈，也至少未見其俯伏稽首，而顯現了可貴的光芒」^[69]。連氏完全站在批判「菁英階層」的立場，林氏則屈意為陳肇興迴護，其實都大可不必。在彰化城被攻破之時，另有北路協副將夏汝賢也同樣被殺，數月之後接繼孔昭慈道台一職的洪毓琛也積勞過世，陳肇興卻都沒有作詩悼念；可見他當時會寫下這三首詩作，應該是站在私人情誼的立場上，對友朋或長官殉職的衷心哀悼——孔昭慈曾託他辦理聯莊，詩人乃以「知己」相稱；陳肇興1853年中秀才、1859年中舉，已然成為地方上有影響力的紳士階級；而1961年之前擔任彰化知縣的秋曰覲以及等於縣令副手的南投縣丞鈕成標必定與之有所互動。^[70]其中秋氏尚頗能作詩，^[71]提高了兩人曾有密切交往的可能；鈕氏管轄今南投縣境一帶，陳肇興也有宗族在該地居住，頗有往來。^[72]總之，正如《論語·子路》記載：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詩人以私人情誼的立場惋惜這些殉職官員，實亦屬「直在其中」的人之常情，如果他像林豪、蔡青筠等人一樣對其大加批判，反倒顯得太刻薄寡恩、不近人情矣！近年來的數本相關的學位論

[68] 連慧珠，《「萬生反」——十九世紀後期台灣民間文化之歷史觀察》，前引書，頁56。

[69] 林翠鳳，《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之研究》，前引書，頁119-120。

[70] 吳晗，〈論紳權〉：「與其說，紳士和地方官合作，不如說地方官得和紳士合作。在通常的情形下，地方官到任以後的第一件事，是拜訪紳士、聯歡紳士，要求地方紳士的支持。歷史上有許多例子指出，地方官巴結不好紳士，往往被紳士們合夥告掉，或者經由同鄉京官用彈劾的方式把他罷免或調職」，見費孝通編《皇權與紳權》（香港：學風出版社，1990），頁50。另參考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頁283-330；王先明《近代紳士：一個封建階層的歷史命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頁33-66。

[71] 台灣清代著名詩評家王松說：「『花魂』、『花氣』、『花顏』、『花影』，此潛園吟社題也。時同詠四十餘人，具高才飽學之士，工力悉敵，不易軒輊；余惟愛秋雁臣司馬（原註：日覲）所作」，見氏著《台陽詩話》（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頁23。

[72] 顧敏耀，《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研究》，前引書，頁73-80。

文，如連慧珠《「萬生反」——19世紀後期台灣民間文化之歷史觀察》（台中：東海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95）、丁鳳珍《「歌仔冊」中的台灣歷史詮釋——以張丙、戴潮春起義事件敘事歌為研究對象》（東海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5）、吳青霞《台灣三大民變書寫研究——以古典詩文為主》（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等，不約而同的都對於陳肇興對孔昭慈的詩作有批判之意，似有需要再細微分析、妥善斟酌的必要。更何況陳肇興在聽到故鄉彰化城被戴軍攻下時，也作有〈二十日，彰化城陷〉七律一首，帶有對事不對人的批判之意：

卦山^[73]何處擁旌旂，烽火連朝上翠微。^[74]定寨^[75]城空誇犄角，望洋援已絕重圍。優柔養寇機先失，倉卒陳兵計又非。從此瀛壖無樂土，荊榛塞路亂蓬飛。

第三聯表達了對於當政者處理此事的不滿，指出他們兩大過錯：其一是優柔寡斷而坐視八卦會武力擴大；其二是未能深謀遠慮而在倉促之下迎戰戴軍，導致此嚴重的後果，末聯則充滿了無奈與悲觀之意，其搖頭嘆息之狀似在眼前。詩人雖然在前引三首悼念詩作中為了顧念故舊情誼而有較為溢美之詞，但是在〈二十日，彰化城陷〉詩中，對於該批判之處卻仍能秉筆直書，作公正之議論，已經甚為難得矣。

四、寄居山村賦〈詠懷〉

彰化城被戴軍攻佔之後，「時雖安民，而漳泉各分氣類。百姓惶恐，紛紛挈眷逃鄉。漳人得以出入無阻，泉人之出入皆窒礙遭掠」，^[76]幸好陳肇興家族是屬於漳州府平和縣人，^[77]他兩個弟弟終於順利的帶著一家老小來與陳肇興相聚了，相見當時悲喜交

[73] 即八卦山之簡稱也。

[74] 「翠微」意為淡青色的山嵐，如杜甫〈秋興詩八首〉之2：「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

[75] 即八卦山上的碉堡。八卦山又名定軍山，嘉慶17年（1812年）建城時，建磚寨於山上，清代著名的「彰化八景」中之「定寨望洋」即指此處，見周璽等編《彰化縣志》，前引書，頁11。陳肇興於頌聯將「定寨」與「望洋」分別嵌在句首。

[76] 吳德功，《戴案紀略》，前引書，頁8。

[77] 蔣師轍、薛紹元纂，《台灣通志》，前引書，頁400。

集之情，盡見於〈城破，喜二弟^[78]挈家眷至〉一詩中：

倉卒傳烽火，他鄉破膽驚。皇天開殺運，群盜忽盈城。奔走欣無恙，團圞慶再生。空山吾見汝，悲喜不勝情。（其一）

出郭才三日，思家抵一年。無人問消息，何處脫烽煙。握手驚初定，聞言淚未漣。聯床對燈火，破屋話纏綿。（其二）

詩人描述他由驚慌焦急而驚喜歡慶的心情轉變歷程，以及兄弟相見時喜極而泣的場景，不運用任何典故，僅使用極為淺白易曉的文辭，卻讓人覺得頗有「語語皆在目前」^[79]的生動自然之感。當時難民四處流離，陳氏雖然僅寫其個人的家庭境遇，但是何嘗不是當時同樣流離失所、歷經生離死別的廣大人群的共同記憶呢？

陳肇興在與親人相聚之後，也找到了安居之處——他在1862年七月謀刺戴潮春失敗逃亡時，作有一詩題為〈自許厝寮避賊至集集內山次少陵〈北征〉韻〉；1863年的〈殉難三烈詩〉之「許厝寮農民陳耀山」一詩序文中，他自己也追敘道：「自去歲逢亂，挈眷依耀山以居兩載，供應甚厚」，由以上兩條線索可知他在戰亂初期主要是住在許厝寮一地，即今彰化縣社頭鄉的山湖、清水以及埤斗等村，陳、康、蕭為當地三大姓，其中山湖村多陳姓居民^[80]，陳耀山大概就屬該村人士。有學者誤以為他一直居住在牛牯嶺，如施懿琳以為陳肇興「謀刺失敗後，為避禍，肇興輾轉從牛牯嶺逃匿至許厝寮」，^[81]實則詩人謀刺之前即居住在許厝寮；林翠鳳也說：「至同治二年春季，陳氏一家仍能平靜地居於牛牯嶺，……」，^[82]其實早在戴案事起沒多久便已離開牛牯嶺了。而

[78] 林翠鳳認為詩題之「二弟」指的是陳肇興的排行第二的弟弟，見氏著前引書，頁10。事實上他的「二弟」字「仲義」，早於1857年亡故了一當時詩人作有〈哭仲義弟〉以悼念之，該詩中說：「三載荊花損兩枝」，並自註云：「前歲五庶弟殤」，可知他們五兄弟到1857年就只剩下3人，因此此詩題之「二弟」應解作兩個弟弟才是；他在隔年所作的〈祭旗後一日，六保背約〉一詩中也說：「兄弟三人據一寨」，更可作為旁證。

[79] 王國維，《人間辭話》語。

[80] 洪敏麟，《台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下》，前引書，頁362。

[81] 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前引書，頁157。

[82] 見林翠鳳，《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之研究》，前引書，頁51。

從前引〈三月十六日，奉憲命往南北投聯莊遇亂，避居牛牯嶺，即事述懷（其三）〉一詩即知他因為牛牯嶺已成為戴軍勢力範圍，不得以只好遠離原本投宿的民居而流浪在山野之中，很明顯的並未在牛牯嶺長時間定居下來。台灣文史研究者鄭喜夫敘述道：「彰化城陷後，陳肇興之二弟挈家眷至牛牯嶺，遂往許厝寮農民許耀山以居」，^[83]大致允當。茲事關係頗大，例如〈山居漫興〉與〈消夏雜詩〉等著重寫景之詩作，所描繪者便非牛牯嶺之景，乃許厝寮附近之景，不能張冠李戴。^[84]

雖然此時戴萬生與林日成在攻下彰化縣城之後，率領各路好漢開始南征北討，中部平原一帶仍然兵戈擾攘：鹿港、阿罩霧、大甲、斗六、嘉義等重要據點都被氣勢正盛的戴軍圍攻，但是陳肇興在許厝寮的生活卻是獲得初步的安頓。在他參與暗殺戴潮春計畫失敗之前的這段時間，其詩作內容雖然較少對於慘酷戰亂或踴躍逃難的直接描述，但是詩人難道就準備在此處長久安居觀望？滯留在許厝寮當時的心境是如何呢？就在〈詠懷〉（共五首）的內容中可以窺知一二。

正式進入探討詩作內容之前，有必要先對詩題分疏探究一番。若以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在《S/Z》所提出的「五種符碼」（分為「佈局符碼」、「意素符碼」、「文化符碼」、「闡釋符碼」以及「文化符碼」等，^[85]「符碼」或譯為「語碼」）分析此一詩題〈詠懷〉，可發現其中具有兩種符碼，一為「意素語碼」（或譯為「內涵符碼」）：「詠懷」乃「抒發情懷」之意，即〈詩大序〉所說的：「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因此由詩題可知這五首都屬於抒情類的詩作；另外一個層次則是「文化語碼」，指

[83] 鄭喜夫，〈吳芸閣先生年譜初稿（二）〉，《台灣風物》31卷2期，1981.06，頁106。

[84] 林翠鳳論述〈山居漫興〉、〈消夏雜詩〉、〈雨後溪上望月〉以及〈日暮晚眺〉等詩作云：「而筆者每每讀詩至此……加以想及至今仍是綠野連疇，山色秀麗的牛牯嶺風光」；而對〈詠懷〉則解說道：「而牛牯嶺一地，便是可以暫時安居，耕稼保全的世外桃源」，皆是因為以為陳肇興避居在牛牯嶺，致有此誤解。見氏著《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之研究》，前引書，頁62。

[85] Roland Barthes, 《S/Z》，Richard Miller英譯（New York：Hill and Wang, 1974），頁21；屠友祥中譯（台北：桂冠，2004），頁28；古添洪，《記號詩學》（台北：東大圖書，1999），頁288-289。

的是各種已經成規化了的社會文化背景知識，而此詩題的指涉對象很明顯的就是中國魏晉時期著名詩人阮籍開創的「詠懷詩」傳統，而阮籍的處境及其作品的特色是否也是陳肇興想要刻意形成的隱喻呢？阮籍（210-263）生活在魏晉鼎革之際，身處司馬家專制獨裁的恐怖統治之中，他面對此一黑暗的現實，雖然在行動上「縱酒昏酣，遺落世事」，但是內心極度苦悶，「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86]而〈詠懷〉82首五言詩則為其代表作，詩中內容有少數可看出是暴露司馬家的暴虐以及曹魏朝廷的腐敗，也有表示個人堅貞的性情以及避禍遠世的消沈意識。但是，就其表現手法而言，則大量使用比興手法——或用自然事物象徵，或用神話遊仙暗示，^[87]《文心雕龍》說「阮旨遙深」，《詩品》則評為：「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阮籍與陳肇興在處境方面或是同名詩作的創作風格上，皆頗堪比擬。擁有此一破譯「文化語碼」的先備知識，將有助於了解陳肇興這組〈詠懷〉詩作，其首篇云：

空谷有幽蘭，歲久生荊杞。春風時一花，綠葉何靡靡。
抱此王者香，^[88]掩沒榛莽裏。采佩雖無人，芬芳常在己。
遙睇茝與薜，葳蕤^[89]被江沚。九畹長莓苔，悵望隔秋水。
（其一）

《樂府詩集》之〈琴曲歌辭·猗蘭操〉引《琴操》曰：「猗蘭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聘諸侯，莫能任，自衛反魯，隱谷之中，見香蘭獨茂，喟然歎曰：『夫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眾草為伍』，乃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辭於香蘭云」，可

[86] 前後二段話皆見《三國志·魏書·阮籍列傳》注引《魏氏春秋》。

[87] 游國恩等主編，《中國文學史》（香港：中國圖書刊行社，1992），頁222-224；葉嘉瑩《阮籍詠懷詩講錄》（台北：桂冠，2000），頁1-18。

[88] 《樂府詩集》之〈琴曲歌辭·猗蘭操〉引《琴操》曰：「猗蘭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聘諸侯，莫能任，自衛反魯，隱谷之中，見香蘭獨茂，喟然歎曰：『夫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眾草為伍』，乃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辭於香蘭云」。

[89] 林翠鳳以為「若易為『威蕤』，作動詞，『分披』、『茂盛』之意，或更合宜，用以形容上句『茝與薜』之茂盛生長於江邊，兩句合貫一意，詩意方更顯流暢」，見氏著《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之研究》，見前引，頁66。其實，「葳蕤」本身就是形容枝葉繁密，草木茂盛的樣子，詞性並非動詞而是形容詞或副詞，如《文選·王粲〈公讌詩〉》：「昊天降豐澤，百卉挺葳蕤」，張九齡〈感遇詩〉：「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皆然，「威蕤」、「葳蕤」為同義詞，並無用法或詞性之別。

見以「空谷幽蘭」做為君子生不逢時之「象徵」(symbol)有其悠久的文化傳統。另外，詩中還影射一位歷史人物，雖未明言，但是卻也呼之欲出——屈原，詩中不少詞句皆呼應〈離騷〉之名句：「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陳肇興在此後還仿屈原作一首〈卜居〉，由此可見他在當時的情境之下，頗將本身與屈原之經歷類比；^[90]而所比擬者並非屈原無辜受謗的悲憤心情（陳氏並無類似遭遇），而是三閭大夫以高風亮節之品格，竟然會淪落到「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見《楚辭·漁父》）的這種經歷——陳肇興於1859年高中舉人，正想在人生路途上繼續實現人生理想並且好好為鄉梓服務之際，才隔兩年就遭遇此天摧地塌的巨變而流落於鄉野之中，因此，使他不禁自比於屈原而有不勝歔噓之感。其第二首則轉自憐自傷之情而為堅毅自誓之慨：

寒色上枯桐，涼颼吹古柳。仰視浮雲飛，白衣變蒼狗。感此百慮并，思君行役久。披榛采芳蘭，榛多荊傷手。不惜妾手傷，但念君情厚。千里一寄贈，誓永不相負。（其二）

此作令人聯想起〈古詩十九首〉中的「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涉江采芙蓉〉）、「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行行重行行〉）以及「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庭中有奇樹〉）等詩句，其寓託(allegory)之意十分明顯，以下三首亦然：

精衛填滄海，銜石不辭勞；杜鵑思故國，啼血長自號。古來奇傑士，志氣與天高。仲連恥帝秦，正平辱罵曹。片語奪狂魄，萬古稱人豪。生非重泰山，死非輕鴻毛。嘆息此風靡，涕泣沾衣袍。（其三）

壯士鄙雕蟲，千金買一劍。騎馬出國門，凜凜吐光燄。斬蛟惡水溪，刺虎清風店。恩怨身未酬，風塵人已厭。登高望中原，生靈正昏墊。中夜一投袂，雷霆起帷幃。雞鳴非惡聲，去去勿回念。（其四）

[90] 1854年端午，陳肇興有詩作〈端陽〉云：「離騷讀罷天難問，腸斷懷沙屈大夫」，可見他早年便對屈原頗為景仰，而對其《離騷》殆亦爛熟於胸。

舉世尚散誕，陶公獨任真。茫茫千載後，為我指迷津。置身羲皇上，抗志懷葛民。偶逢天地醉，飲酒以全身。竭力勤農畝，餘事作詩人。松菊三逕秀，^[91]榆柳一家春。^[92]即此是桃源，何處尋避秦。（其五）

這些詩作皆具樸質自然的特色，帶著古意；其中有以空谷幽蘭象徵自己性情的堅貞；也有以精衛填海、杜鵑啼血等神話傳說自誓；也有通篇都用「借喻」的方式，將自己比擬為帶著寶劍要去殺虎斬蛟的壯士，以平定亂事、拯救蒼生自期；更有提到「義不帝秦」的魯仲連、「擊鼓罵曹」的禰衡以及棲身田園的陶淵明等詩人十分嚮往的人物形象。我們發現其寫作的手法以及部分思想雖與阮籍〈詠懷〉頗有類似之處，但是陳肇興寫來顯得更為平易淺近，無阮氏「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之病。^[93]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前四首儘管飽含勇猛奮發之氣，但是到了最後一首卻說要學習「飲酒以全身」的陶淵明，而且還說「即此是桃源，何處尋避秦」，反倒有在此久居避難、獨善其身的想法（此在後文要論述的〈山居漫興〉等詩作亦可得知）。其實，由詩中語義的衝突正可看出詩人這時的心境恐怕不是像某些學者認為的那般堅決篤定，^[94]毋寧有種矛盾猶疑的情結。在戴案之前，雖然他也有過逃避地方動亂的經驗，^[95]但是處於這次風起雲湧的大型民變，他心中難以逆料亂事到底會持續多久，也不知道該以怎樣的行動來面對，想要先避難以全身，亦屬人之常情。這雖然與先前學者刻畫他一貫的堅決「丹心報國、慷慨赴難」之形象不完全符合，但是由此也可看出陳肇興是十分誠實的道出內

[91] 陶淵明，〈歸去來辭〉：「三逕就荒，松菊猶存」。典故出自趙岐《三輔決錄》：「蔣詡，字元卿，隱於杜陵。舍中三逕，惟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挫廉逃名」。

[92] 陶淵明，〈歸園田居（五首之一）〉：「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

[93] 語出《文選·阮嗣宗詠懷詩十七首》引顏延年、沈約注。

[94] 林翠鳳云：「在陳肇興內心深處，有一股更強烈更持久的意念，是那無庸多疑的赤膽忠誠……陳肇興有〈詠懷〉五詩之作，十分明確地道出了自己的心志，在日後的歲月中，雖然世路崎嶇，陳肇興之心志與作為，卻大致不離此道，可以說，至少在戴潮春是件發生的兩年期間，〈詠懷〉五詩，大體上是陳肇興立身處事最典型的表徵」，見氏著，前引書，頁66-67。

[95] 陳肇興作於1853年的詩作〈王田〉與〈賴氏庄〉，可知他在當年曾經帶領家人從彰化故居輾轉逃難而出，先後在今台中市北屯區與台中縣烏日鄉等地居住過。該次動亂為「東螺保械鬥」，見顧敏耀《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研究》，前引書，頁110。

心之所感，而非刻意塑造某種符合傳統意識型態的虛假形象，從詩中可看出他心境的真實轉折，正如《易經·乾卦·文言》所說的「修辭立其誠」，此反倒才是詩人可貴之處。

五、山居漫興以遣悶，王師登岸而誌喜

陳肇興當時避居之許厝寮位於八卦山脈西側，為平原與山林的交界地帶，因此乃有〈山居漫興〉（八首）之作。詩人先從頭說起，敘述他剛開始聽到彰化縣城被攻下之後的感受：

忽報孤城陷，蒼茫百感新。半生輕結客，此日愧知人。拾橡杜陵叟，負薪朱買臣。悲歌聊度日，不敢怨清貧。（其一）

寂寞空山裏，無人獨掩扉。養茸麋鹿馴，分子鯉魚肥。習字妻磨墨，熏香婢拂衣。憂來頻命酒，勉強學忘機。（其三）

首二句道盡他初聞城破之際的四顧茫然與百感交集之心境，而得知竟然是結交多年的戴潮春擔任領袖，更是出其意料之外——由此可見不僅戴氏本人原無反叛之心，連結識多年的友朋也想不到他竟會如此。而陳肇興由原本居住的古彰化縣首善之區落到邊鄙林野之地，在山林中長時間居住是他先前從未有過的經驗，這讓他不禁想起了「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96]的朱買臣以及「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裡」^[97]的杜甫，深感自己與他們一樣生活困頓——俗諺有云：「窮秀才，富舉人」，陳肇興已在1859年高中舉人，隔年首倡捐貲修建故鄉的「威惠宮」（今彰化市內，俗稱「聖王廟」），^[98]家中亦築起藏書甚多的「古香樓」，其亂前所作的〈閒居〉有云：「古硯墨留銅雀瓦，薰爐火熱寶瓊香」、「玻璃四面為吟榻，也抵仙家白玉欄」，總總跡象都看出來他家境頗為優裕，^[99]因此，亂起倉促導致他流落

[96] 語見，《漢書·朱買臣列傳》。

[97] 見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其一。

[98] 顧敏耀，《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研究》，前引書，頁42。

[99] 林翠鳳云：「長期以來，陳肇興家中並不富裕」，見氏著《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之研究》，前引書。此說恐怕未盡然，其實應該說：他早期曾經度過一段較為清貧的生活，但是至少在戴案之前已經頗為富足。

至此，雖然身邊仍有妻婢陪伴，但仍不免有清貧之嘆。〈山居漫興〉的其他詩作也透露陳肇興能夠在此避難而深感慶幸的心情：

一身如逐客，數日寄巖阿。世亂乾坤窄，山深雲雨多。生涯依木石，時事閱兵戈。不見天邊鳥，高飛避網羅。（其二）

燕去泥猶落，蟲飛雨欲來。山林饒樂趣，豺虎恕庸才。竹迸松根茁，蘭穿樹腹開。桃源無處覓，雞犬漫相猜。（其四）

此地勤耕稼，年來幸有秋。薊花巢白鳥，蔗葉飼黃牛。瓜果參差熟，田園次第收。相憐多父老，挈榼^[100]到牆頭。（其七）

三春花落後，四月雨晴初。鑿地開山沿，^[101]留泉灌野蔬。屋從吾輩老，谷合乃公愚。^[102]日共村翁醉，方知樂不如。（其八）

由詩作內容可看出陳肇興一家雖然在此地頗有鄉人給予接濟，但是他也自覺此地並非絕對安全；雖然他此時按兵不動，未向四周圍的鄉人們明顯表露個人立場，但是附近支持戴軍的居民已經對陳氏猜忌提防，只是尚無加害之意（即詩中將附近居民比為「豺虎」，而說他們能夠「恕庸才」者），他也呼應〈詠懷〉一詩所說「偶逢天地醉，飲酒以全身」，與村翁共醉而暫時忘記令人煩憂的現實處境。詩人不僅藉著詩歌創作來抒發個人情懷，還用頗多筆墨以畫出一幅台灣山林的旖旎風光以及農民質樸勤奮的生活場景，含有甚多生機盎然、令人耳目一新的佳句。此外，詩中「薊花」一詞頗值得注意，所指即為「薊桐花」，「薊桐」或作「刺桐」，《番社采風圖考》有云「番無年歲，不辨四時，以刺

[100] 《說文解字》：「榼，酒器也」，「挈榼」指手提著酒器，劉伶〈酒德頌〉：「止則操卮執瓢，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

[101] 「沿」字必有訛誤，此處按照律詩格律應作仄聲，且「鑿地開山沿」語義稍嫌欠通，「山沿」不知何指；然而各版本皆如此，筆者推測可能是「路」字形近致誤。

[102] 本詩為「平起格五律」，因此頸聯格律應作「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才是，所以「屋從吾輩老，谷合乃公愚」的「屋」字（入聲）不合格律，且詩意頗費索解，恐亦有誤。

桐花開為一度」；^[103]《台灣縣志》記錄道：「荊桐，葉微似桐而小，花殷紅，二、三月盛開，遠望遍樹如火」，^[104]當時恰正是荊桐花開的三月份，而詩人不套用中國歷代形容三月的詩詞套語（如「紅杏」、「桃花」、「煙柳」之類），而代之以極富台灣在地特色的「荊桐花開」與「蔗葉收割」（當時台灣糖業已經頗為發達），直是一幅生動的台灣農村圖。以下這首亦然：

偶閱巖前稼，時來原上行。分秧遲閏夏，種豆急新晴。地瘦宜瓜植，田磽帶石耕。誰知抱甕者，原是一書生。（其五）

陳肇興是我國清領時期古典詩人當中，少數能夠深入刻畫農民生活者，在戴案前即有〈初夏郊行〉、〈暮春書懷〉、〈齋前觀穫〉、〈春田四詠〉、〈秋田四詠〉等等膾炙人口的作品，^[105]正如台灣文學研究學者龔顯宗所說：「不論是寫蔗車、稻花、收穫，都歷歷如繪，迥非王維、陶潛之流所能比擬，唯有身在其中，熟悉農村的人方能寫出這種親切、自然、質樸的文字！」，^[106]陳肇興縱使流落山林鄉野之間，也同樣不改其關懷農民生活的本色。〈山居漫興〉第六首則表現出他心中熱切的期待：

巘疊復巒重，尋幽偶寄蹤。草深沒人跡，山缺擁雲峰。將帥思擒虎，經綸懷臥龍。沉吟無限思，日暮倚青松。（其六）

從對仗頗為工整的頸聯可看出詩人極為盼望朝廷能夠派出像韓擒虎、^[107]諸葛亮一般的勇將良臣來平定亂事。這種期待的心情在〈端午飲家與三茂才舍中，聞大軍登岸，口占示喜〉也說得十分明顯：

[103] 六十七，《番社采風圖考》（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7），頁16。

[104] 陳文達，《台灣縣志》（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3），頁26。

[105] 關於此主題，林翠鳳有深入論述，見前引書，頁136-165、234。

[106] 龔顯宗，《台灣文學家列傳》（台北：五南圖書，2000），頁121-138。

[107] 韓擒虎（538-592），隋朝滅陳的猛將，見《隋書·韓擒虎列傳》。林翠鳳解此句為「若為武將，當力思智勇兼濟，擒惡懲兇」，乃忘記「擒虎」為人名，致有此誤，見氏著《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之研究》，前引書，頁67。

故園回首遍狼狐，端午因君醉一壺。益智未能聊食糴，^[108]
 辟災無術只懸蒲。風塵飄泊年將老，世故周旋興不孤。且
喜王師登海岸，倒懸早晚慰來蘇。

此詩所指的「王師」是誰帶領的軍隊？「登海岸」指的是登陸哪邊的海岸呢？林翠鳳以為是由竹塹出發的林占梅部隊「登陸」大甲，^[109]施懿琳則認為是曾玉明之登陸鹿港，^[110]筆者查證歷史文獻發現這兩件史事同在五月發生：林豪記載：「同治元年五月，總兵曾玉明以兵六百抵鹿港」、「五月，竹塹總局林占梅遣勇首蔡宇帶勇四百名，同歲貢生陳緝熙赴大甲。時值端午，東門小姓欲開城門通貿易，王、陳大姓持不可，相攻殺。適練勇驟至，合擊賊黨，大敗之，群賊皆退，遂復大甲」；^[111]吳德功則云：「五月，總辦台北軍務林占梅、淡水同知張世英，遣蔡宇並貢生陳緝熙帶勇復大甲」，但是「提督軍門固勇巴圖魯曾玉明帶兵六百，由鹿港登岸，招撫各莊義民」此事則記為「五月十三日」；^[112]蔡青筠記載：「五月，林占梅差蔡宇、陳緝熙偕張世英乘賊無備，於端午日率兵闖東門而入；賊大駭，逃奔回彰」，而「廷旨以提督軍門固勇巴圖魯曾玉明提兵平賊」一事也記為「五月十三日」。^[113]由以上記載得知，其一、林豪沒有明確指出曾玉明部隊登陸時間，但是吳蔡二氏則說此事遲至五月十三日，如此一來則陳肇興所指的「王師」即非曾玉明部隊；其二、由各家記載也可知林占梅攻佔大甲並非由海上「登陸」，況且陳肇興也不可能以「王師」稱呼林占梅這批民兵。如此豈不林、施二氏所說皆非？歷史學者黃富三指出：

由於五月十一日徐宗幹仍未准曾玉明度台，因此，五月至鹿港之說不甚可靠，五月十三日尤其不可能，六月應是較

[108] 「糴」乃「粽」之異體字，《藝文類聚·卷第八十七·果部下·益智》引《三十六國春秋》云：「安帝元年，盧循為廣州刺史，循遣裕『益智粽』，裕乃答以『續命湯』」，「益智粽」乃加入中藥「益智仁」的粽子。

[109] 林翠鳳，《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之研究》，前引書，頁264。

[110] 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前引書，頁156。

[111] 林豪，《東瀛紀事》，前引書，頁13、頁20。

[112] 吳德功，《戴施兩案紀略》，前引書，頁13-15。

[113] 蔡青筠，《戴案紀略》，前引書，頁17-18。

可接受的日期。自然，如果徐宗幹先派後請旨，在五月底以前抵鹿港也非不可能。^[114]

既云「不可靠」、「尤其不可能」，結尾又說「也非不可能」，語意模稜含糊，可見黃氏對曾玉明度台之時間仍無法確切定案。其實，時任閩浙總督的慶端早在四月二十四日奏摺中表明他於三月間便已得知戴案事起，文中敘述其處理方案為：

亟應乘此匪黨初集，遴委大員，馳赴督辦，迅速解散殲除。總兵曾玉明久任台灣，聲望素著，為台所信服，呼應較靈，該員經前撫臣瑞璜委令統師赴溫，現抵平陽，奴才已飛飭令曾玉明將其所部台勇交參革道員張啟瑄接，統一面授機宜，令其星飛渡台，調募得力兵勇，剋日親統馳赴彰化，相機剿辦！^[115]

可知在慶端得知此事之後，第一個想到可以派遣來台者即為先前在台擔任武職的曾玉明（已升任福寧鎮總兵），要他把原本帶領攻打太平軍的台勇交給他人，隨即「星飛渡台」。由文中用詞可知應該派遣來台的時日應該不至於拖延太久，故前引黃氏所云「先派後請旨」的可能性頗高，而吳、蔡兩氏之資料殆為誤記。根據陳肇興此詩記載，則曾玉明部隊可能早在1862年端午當日或之前便已從鹿港登陸了；詩中語氣亦透露當時台地反戴陣營者對於曾玉明的期待，當然這些期待不久之後就隨著曾總兵之無法突破僵局、縮居鹿港而破滅了。

在〈端午飲家與三茂才舍中，聞大軍登岸，口占示喜〉之後，還有一首〈虎子山歌〉，中國學者陳貽庭、張寧、陳慶元在《台灣才子》一書中，認為這是一首「對貪官污吏的惡行揭露得罪為大膽的詩」^[116]，果真如此嗎？且先錄其詩如後：

虎子山，禾芄芄；昔時民田今在官，官家有田萬千頃，取諸頑民民不省。田園父老為予言，此是當時陳家園。陳家昔日擅豪華，俠少盈門囚在家。市上殺人官不問，欄中盜

[114] 黃富三，《霧峰林家的興起》，前引書，頁234。

[115] 見洪安全主編《清宮月摺檔台灣史料》，前引書，頁444。

[116] 陳貽庭、張寧、陳慶元，《台灣才子》（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頁69。

牛誰敢拏？盜牛殺人不知數，可憐天狗墮門戶。朝懸大纛擬侯王，暮上檻車作囚虜。田園萬頃金千億，輸入官倉藏不得。六親散盡總麻空，不論老少皆誅殛。至今春雨杏花時，麥飯無人祭寒食。寒食年年春復秋，桑麻依舊綠陰稠。惟聞隴上耕耘處，夜夜鬼哭聲啾啾。聲啾啾，訴悲愁；前人田地後人收，後人不悟前人憂。君不見唐朝鉏菜翁，臨刑淚交流；又不見今日虎子山之田兮，苗油油？

陳貽庭等人是怎麼解析這首詩的呢？他們說：「百姓的田被官府強佔，可憐百姓無田可耕卻不知受苦的根源在哪」、「錢財、田地終於還是歸了官，辛苦的、遭難的，還是百姓」^[117]云云，恐怕已經偏離詩人創作動機甚遠！詩中的「虎子山」並非指埔里境內有「地理中心碑」的那座又名「虎頭山」者（因為距離陳肇興當時居住的許厝寮地區太遙遠），而是指名間鄉境內的「虎子坑」（今名間鄉東湖村）。至於詩中描述的陳姓土豪又是誰呢？其實就是自稱「鎮溪大王」的陳勇，他與自稱「鎮山大王」的黃馬是結拜兄弟，「素行強橫，結交匪類，佔奪民人田園，把截濁水溪，抽取載貨竹筏錢文」，^[118]與陳肇興詩中所述若合符節，簡直就是地方上的惡霸，他們的勢力範圍約略就在濁水溪中游一帶，陳、黃二人在1842年（道光22年）一起起兵造反，「先於四月初八日，在石圍內同飲血酒，私造白旗二面，上寫『鎮溪大王陳』、『鎮山大王黃』字樣，約期五月初十日豎旗起事」，^[119]這也就是詩中所講的「朝懸大纛擬侯王」，結果，他們到九月就被各方集結而來的官兵給擊敗擒拿了。^[120]想必虎子坑這邊在當年也是陳勇的田產，在他叛變被殺之後，當然被朝廷給查封充公，陳肇興當時就居住在那附近，因此有感而發而有此詩之作，其創作動機應該就是要藉此勸誡當地居民：造反是朝廷大忌，陳勇血淋淋的例子距今不遠，你們可別重蹈覆轍啊！

[117] 前引書，頁69-70。

[118] 姚瑩，《東溟奏稿》（台北：大通書局，1987），頁162。

[119] 同前註。

[120] 姚瑩，〈勦平彰化縣逆匪奏〉，收錄於：姚瑩，《東溟奏稿》，前引書，頁158-164；許達然，〈清朝台灣民變探討〉，收錄於：台灣歷史學會編，《史學與國民意識論文集》（台北：稻香出版社，1999），頁164。

六、歌詠鄉野美景，期盼早日還鄉

由於台灣自清領以來便大小亂事不斷，素有「任反不成，任征不平」^[121]之語，人民對於社會上的動亂也幾乎習以為常；陳肇興原本以為戴案之鎮壓乃指日可待之事，心想數月內即可返回故居，因此戴案前期（1862年七月之前）的詩作當中，除了有關時事的詩作之外，尚留有不少悠閒適意之作，例如〈消夏雜詩〉（共14首）的前五首與最末首：

石壁丹崖小洞天，山如太古日如年。萬竿竹下披襟坐，自有清風不用錢。

避跡山中已半年，貪涼頻到竹林邊。綠陰滿地日亭午，自枕松根企腳眠。

雨過園林景色清，可人風日是新晴。無端喚醒南柯夢，萬木陰中一鳥鳴。

排闥山光四望青，登臨只隔一漁汀。偶攜鴉嘴鋤雲去，掘得千年老茯苓。

門前溪水綠漫漫，小坐垂綸意自寬。靜極不知魚上餌，一雙蝴蝶立漁竿。

蒼藤碧樹綠交加，乳燕雙飛日影斜。一陣晚風香不斷，檳榔破孕欲開花。

詩中使用「自有」、「自枕」以及其他表明單人活動的詩句，顯示詩人能夠獨自享受悠閒生活之樂趣，有如陶靖節所謂「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的心境。此外，陳肇興也藉此避居山中的難得機會，盡情描寫山林中獨特的景致，諸如前引詩中的「萬竿竹」、「萬木陰」、「千年老茯苓」、「蒼藤碧樹」以及「檳榔花」等等，極能表現該處渺無人跡的「山如太古」之景；更有綠溪垂釣、深山鋤雲、竹林長坐與松下小睡等徜徉在青山綠水中的生活記錄，這些詩句若在炎炎夏日讀來，直令人遍體生涼而心曠神怡。其所描寫的山林就是許厝寮東邊八卦山麓之觀音山林區，

[121] 吳子光，《台灣紀事》（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6），頁5。

也就是目前社頭鄉清水巖寺附近一帶。^[122]

除了山林幽居之閒趣之外，此組詩中也有兩首描寫附近稻田農忙之景（其九、其十二）：

平疇來往笠團團，一片驕陽汗不乾。漫道裸裎能浼我，^[123]
野人原不著衣冠。

山田青綠水田黃，看慣人家刈稻忙。烏雀也知禾黍熟，謹
呼飛下野人場。

當時正值農曆五、六月份，正是台灣稻作（每年兩熟）之第一次收割，也是火傘高張的炎炎夏日。前首生動的描繪出農人辛勤工作的情景：陳肇興在開頭第一句不直接寫人跡雜遝、人聲鼎沸，卻描繪農田平疇之間有一頂一頂的斗笠來來往往之景，別出心裁而予人以深刻的視覺印象；接著刻畫農人們在豔陽下揮汗如雨的形象，而末兩句運用了《孟子》的典故，語氣中對於這些樸實工作的農人充滿體恤愛惜之意。此首並未說出農人們所忙碌從事者為何，至前引第二首才清楚點明農人們是為「刈稻」而忙。大家辛苦的耕作了數個月，此時當然是懷著歡喜的心情在收割，但是詩人同樣不直接白描農人們歡欣鼓舞、笑容滿面，卻以擬人的手法描寫烏雀歡呼著飛到田裡啄食掉落的穀粒，此正是運用烘托的手法，正如金聖嘆批《西廂記》之所謂「烘雲托月」之法：「欲畫月也，月不可畫，因而畫雲；畫雲者，意不在於雲也，意固在於月也」，陳肇興在此詩中也藉由烏雀之歡呼而加深歡樂的氣氛、烘托人們歡喜收割之心情，並且間接透露該年收成之豐稔。

[122] 該處近年已築成「觀音山登山步道」，全長1.5公里，沿途高低起伏，風景秀麗，為中部民眾登山健行、享受森林浴的熱門景點；筆者認為或可仿彰化市郊八卦山公園之「文學步道」，或仿中國名山之「摩崖石刻」，將這位「彰化傳奇詩人」陳肇興創作於此的詩歌佈置於登山步道旁，既可讓民眾一邊運動健行，一邊欣賞文學之美，更能發揮「藻飾山河，潤色鴻業」之效，足以與此地山林之美相得益彰。早在六七〇年代，許多戰後移民於遊歷台灣名山勝水之後，多有類似看法，例如胥端甫〈從伏羲橫貫公路聯語談摩崖石刻文化之重要〉闡發頗多，收錄於氏著《芝山談藝錄》（台北：商務印書館，1969），頁69-90；另外阮毅成1970年發表於《大華晚報》的〈山川有幸是台灣〉也有類似看法，見氏著，《散文選集》（台北：商務印書館，1975），頁221-223。

[123] 化用《孟子》書中典故，其〈公孫丑上〉與〈萬章上〉兩章都有此句：「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裊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

若單看前引八首詩作，或許會以為陳肇興創作這組〈消夏雜詩〉當時的心情都是閒適快意、無憂無慮的，事實上，其餘的六首詩作則表現詩人在戰亂中的鬱悶傷懷：

匝月幽居不出門，舊時山徑長苔痕。一甌苦茗三升酒，消受文人日又昏。

地僻無人問索居，清風入戶替翻書。紙窗竹屋烏皮几，手寫唐詩一月餘。

楓林日暮晚風涼，散步誰知抱恨長。人自趨炎吾耐冷，兩般氣味各分嘗。

烽火兼旬信息沉，故園回首棘森森。幾回欲覓來人問，相對無言淚滿襟。

曾見黃巾此地過，連天鼙鼓達巖阿。兒童未解逢離亂，強折生梢學舞戈。

為憐高潔絕塵氛，愛汝蟬聲樹裏聞。^[124]笑殺於陵陳仲子，不能如蚓又輸君。

詩人困居許厝寮民居之內，百無聊賴之際，只能借茶酒澆愁，抄寫唐詩以消磨時間；要開口向來人探聽故鄉消息，卻「未語淚先流」，心中極度苦悶又萬分煩憂。至於詩中提及戴軍部隊曾經鑼鼓喧天的路經此地，如此浩浩蕩蕩究為何事？原來是戴潮春親自從今台中市北屯四張犁（戴氏故居）經過草屯、南投市，而往竹山舉行「耕籍田」與「祭天地」的祭祀儀式，藉此壯大聲勢、凝聚人心。林豪記載其盛況云：「遠近來觀者不下數萬人，遍野漫山，惟見萬頭蠢動。百姓爭送豬羊米穀無算」，^[125]此時是「紅旗軍」氣勢最高昂的時期。而詩中出現的「蟬」，於漢詩傳統中，一般皆為高潔的形象，最為人所知者為李商隱〈蟬〉：「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薄宦梗猶泛，故園蕪已平；煩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清」，陳肇興殆亦以吸取樹

[124] 「蟬」於漢詩傳統中，一般皆為高潔的形象，最為人所知者為李商隱〈蟬〉：「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薄宦梗猶泛，故園蕪已平；煩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清」。

[125] 林豪，《東瀛紀事》，前引書，頁59。

汁、餐風露宿的蟬來自比。另外還有「於陵陳仲子」、「如蚓」之典故，是出自《孟子·滕文公下》，齊人匡章向孟子誇口說：「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聽了之後笑著說：「如果這樣子不時人間煙火才叫做廉潔的話，那真該化作蚯蚓才行」（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陳肇興在此亦屬苦中作樂，自嘲境況大概與那餓到與蟲爭食李子的陳仲子差不多。不管是「蚯蚓」或是前述的「蟬」，可見乎詩人當時已經面臨斷炊的困境了。

此外，看到戴軍人氣頗高，而原本期盼能夠弭平戰亂的曾玉明部隊又毫無進展，詩人心中越來越焦急，其〈夏日偶成〉云：

寂寂柴門晝不開，山花零落滿蒼苔。蠨蛸在戶風初定，螻蟻遷家雨欲來。亂後文章多散失，窮來人事廢追陪。關心只有憂時淚，欲掃黃巾苦不才。

縱然心急如焚，但是對方勢盛，也莫可奈何。詩中以「螻蟻遷家雨欲來」借喻戴潮春在竹山一帶集結大軍，恐將開始四出攻伐（史籍記載確實也如此發展）；^[126]「蠨蛸在戶」者，則出自《詩經·國風·豳·東山》：「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疃鹿場，熠熠宵行」，描寫的是歷經戰亂之後，回到故鄉所看到的破敗景象。索緒爾認為構成語言系統有兩大結構，一為「語序軸」，一為「聯想軸」，^[127]這句「蠨蛸在戶」處在漢詩語言系統的「聯想場」（champ associatif）內，不禁令人聯繫該詩句出處的〈東山〉詩中四段開頭都重複唱著的詩句：「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其哀傷的語調也在讀者耳邊迴旋，詩人藉此幽微的表現身處戰亂中的滿腹憂愁。此種手法同樣見於〈雨後溪上望月〉一詩之中：

[126] 吳德功：「賊勢遂浩大，日議進取之策。偽丞相獻計於戴曰：『當今聲勢日熾，千歲當先取斗六，進攻嘉義，以圖台南；檄大元帥林晟進攻大甲，以窺淡水一帶』。戴逆從之」，見氏著《戴施兩案紀略》，前引書，頁18。

[127] 羅蘭·巴爾特著，王東亮譯，《符號學原理》（香港：三聯書店，1999），頁50-51；葉嘉瑩，《唐宋詞十七講》（台北：桂冠圖書公司，2000），頁30-31。

驟雨洗山容，清風送林樾。^[128]忽隨流水聲，溪上望明月。
四顧寂無人，長歌采薇蕨。

此詩與〈三月十六日，奉憲命往南北投聯莊遇亂，避居牛牯嶺，即事述懷〉同樣用了「采薇」之典故，正如前文所述，此典一擊兩響，除了指伯夷、叔齊兩人潔身自愛，采薇而食之外，也指向《詩經·小雅·鹿鳴之什》中的〈采薇〉篇。該篇是兵士在戰爭結束之後，回歸鄉里途中所作，其首段云：「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陳肇興乃以「玁狁」譬喻戴軍，說明他之所以「靡室靡家」、「不遑啟居」（皆為無法安居、四處流離之意），皆是戴軍之故。陳肇興此時雖然未歸鄉，但是在寂寥黑夜的溪邊，已經在望月唱著〈采薇〉，心中大概想像著：「我在亂後若平安回到故居，心情恐怕與〈采薇〉之詩人相彷彿吧」，思鄉之情甚為濃厚。詩中巧妙的化用伯夷、叔齊以及《詩經》的典故，形成「文約義豐，言盡意餘」之效，藉著聯想作用而有「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深厚意蘊。

詩人在許厝寮困坐愁城有四個多月，前期尚有享受山居閒趣的興致，愈到後期則期待亂事早日平定的心意愈見強烈。例如〈七夕示內〉（在台灣古典詩史上目前發現的極少數寫給妻子的詩作之一）：

世路干戈感未休，天涯容易又新秋。一家離散悲戎馬，萬古團圓羨女牛。有巧任從兒輩乞，無錢長替內人愁。私心默向雙星祝，早^[129]掃欃槍^[130]慰白頭。

陳氏家人倉促出逃，帶出來的金錢細軟至此時恐怕使用殆盡，前

[128] 樹蔭。《玉篇·木部》：「樾，楚謂兩樹交陰之下曰樾」。

[129] 鄭喜夫纂訂之《陶村詩稿全集》（見前引）「早」字作「旬」，然而楊珠浦編集《陶村詩稿》（台中：台灣新民報社，1937；台北：龍文，1992）以下諸本皆作「早」，應是手民之誤。

[130] 《爾雅·釋天》：「彗星為欃槍」，而古語有所謂「欃槍為兵，赤地千里」，後世以之代指兵災戰亂，如杜甫〈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幾時迴節鉞，戮力掃欃槍」；李商隱〈五言述德抒情詩一首四十韻獻上杜七兄僕射相公〉：「寄辭收的博，端坐掃欃槍」。此雖是使用典故代指，但是，在戴案事起之前，台灣的天空上的確出現彗星，吳子光記道：「將亂前數月，彗星屢見，見輒旬餘」，見氏著《台灣紀事》，前引書，頁24。

引〈夏日偶成〉已可看出他們的經濟情況日漸捉襟見肘，於此詩中則描述快要面臨斷炊的境地，這使他不禁衷心的向牛郎織女星祈禱能早日弭平事變，回到正常生活，也讓高堂老母能夠不用遭受逃難之苦，在〈柴關〉詩中也透露此高度企盼之意：

清泉白石鎖柴關，豪氣銷殘夢寐間。屈指百年驚漸老，回頭萬事不如閒。悠悠落日牛羊下，策策空林倦鳥還。唯有丹心依舊在，浮雲望斷海中山。

在日暮時分，牛羊下山歸寮，倦鳥紛紛回巢；詩人以此意象隱含希望自已也能夠早日回歸故鄉之託喻。詩人蟄居此處多時，頗感年華虛度、豪氣消磨，只能盼望海峽對岸能早日派遣軍隊渡海平亂。此種心思在〈日暮晚眺〉則是通篇都用借喻手法表現：

白日忽西墜，黑雲俄四封。偶依門外樹，遙睇霧中峰。野曠雷聲大，天低雨氣濃。負薪應未返，佇立望家僮。

雖然此詩亦可依據其字面意義解釋，但是日暮時分的暗紅色太陽應該是緩緩隱沒而非突然下墜，且四周按照常理應是彩霞而非黑雲，故而首聯描寫的景色很有可能不是真實情景，而是作者心中的意象——隱喻戴案有如晴天霹靂一般的爆發，讓他頓時措手不及；後三聯則描述他投靠農家之中，頗有束手無策之感，只能盼望官軍（以上山採樵之「家僮」比擬）儘早派兵前來彈壓而已。在林占梅當時的詩作也屢屢得見此種期待，例如〈戒嚴〉云：「王師指日從天降，會見奇勳著海東」，〈得徐樹人師撫閩信，賦此誌喜〉云：「更欣橫海樓船集，一旅能消孽氣腥」，〈團練〉也說：「守望祇期吾圉固，瞬看渡海有飛旌」，可見當時文人恐怕都已清楚看出駐紮在台地的官兵以及其他民間武力都無力對亂事有效彈壓，斷言必定要從對岸再派遣軍隊才能蕺事。陳肇興在此詩之後，接著有〈董逃行〉、〈寄林文翰舍人〉以及〈感事漫興〉等詩作，對官軍的期待漸轉為失望與不耐，也興起自力救濟之意，終於在7月15僱請殺手行刺戴潮春，失敗之後讓他只好亡命集集深山避風頭，該時期的詩作也頗為可觀，留待日後再論。

七、結論

曾經創作有關戴案之詩作者，除了本文主角陳肇興之外，創作數量較多的是林占梅，作有〈戒嚴〉、〈團練〉、〈南征八詠〉、〈南征紀事〉等二十餘首，^[131]其他同時代文人而有零星詩作者有吳子光（〈紀變絕句（四首）〉）、陳維英（〈擒戇虎行〉）、^[132]林豪（〈聞雪村都轉連戰皆捷，遂復彰化，喜作四首〉、〈途次哭義首羅冠英三十四韻〉、〈圍城雨〉、〈牽衣哭〉等）、^[133]李逢時（〈冬至日獲彰化縣報捷書〉、〈贈丁觀察〉、〈贈林提帥〉）、^[134]賴時輝（〈巡城口占〉、〈潮春攻城解圍誌感〉），^[135]日治時期則有賴和（〈月琴的走唱〉、〈讀台灣通史十首（其八）〉、^[136]賴惠川（〈竹枝詞〉三首）、^[137]蔡水震（〈義民塔〉）、^[138]林幼春（〈鐵礮碑成，自題長句誌感（代灌園作）〉）等，^[139]這些作者與陳肇興相較之下，不管是對於戴案的參與程度或是詩作創作數量皆瞠乎其後，雖然陳氏詩作的意識型態未能像賴和一般寫道：「戴潮春亦一時英」^[140]那樣完全跳脫傳統文人社群維護既有秩序的意識型態，但是已能較為公允的評論時事動態與官府作為。此外，透過前文的論述可以發現詩人將個人的經歷與大時代的動亂相結合，具備深厚的歷史感與現實感，由聯莊防亂、驟然遇亂、流離山野、弔輓官吏、家眷團聚、

[131] 林占梅著，徐慧鈺等校記，《林占梅資料彙編（一）：潛園琴餘草》，（新竹：新竹市文化中心，1994），頁594-632。

[132] 全台詩編輯小組編撰，《全台詩（第五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頁160。

[133]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灣詩鈔》（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7），頁91-105。

[134] 李逢時，《泰階詩稿》（台北：龍文，2001），頁75。

[135] 賴子清，《台海詩珠》（台北：自版，1982），頁225-226。

[136] 賴和，《賴和全集：漢詩卷（下）》（台北：前衛，2000），頁323、444。

[137] 賴惠川，《悶紅墨屑》（嘉義：自版，1957），頁12-13。

[138] 賴子清，《台灣詠史詩》，《台灣文獻》9卷4期，1958.12，頁48。

[139] 林資修，《南強詩集》（台北：龍文，1992），頁41。該「鐵礮碑」碑文為台南進士陳望曾（1853-1929）所撰，文曰：「前清同治元年，匪陷彰化城，勢張甚；匪魁戇虎晟擁眾三萬六千餘人，環攻阿罩務者三晝夜。時林公奠國及其男文鳳公率族中健者七十二人扼險轟擊，敗之，乃潰散；以至寡克至眾，厥功偉矣！今擊賊鐵礮尚存。望曾昔至其鄉，聞其語，復見其人，所知尤確。恐歲遠而或不足以徵信也，撰此書石，貽其後人，俾永垂紀念焉」，見連橫編《台灣詩薈》（台北：成文，1977），頁95。

[140] 賴和，《賴和全集：漢詩卷（下）》，前引書，頁444。

山居野趣以及窮愁思鄉等等，他親身深入戴軍核心地帶，以真誠寫實的筆觸，描寫所見、所聞、所感，足以裨補史料之闕漏並印證相關記載，也為當時許厝寮一帶鄉野風光留下了珍貴寫真。

本文所討論的陳肇興詩作約略是作於1862年初的戴案爆發前夕，一直到該年的七月中旬左右，當時戴軍正是聲勢浩大的時期。總兵林向榮要出兵攻打戴軍之時，有人向他獻策說：「台灣大勢，內山皆漳，海口皆泉。今漳人方附賊仇泉，若由海口進兵，則泉人爭起為官，勝氣百倍。況就地購糧，可省轉運虛費，尤策之便者」，^[141]這段話正好說明當時的情勢：戴軍在中部地區主要的勢力範圍乃漳州人佔多數的地區，因此，戴潮春本人才會親自到漳州人聚居的「水沙連」地區行藉田禮、祭天禮以廣作宣傳、收攬人心，並收到極佳的效果。但是陳肇興身處該地，立場又如此鮮明，而根據他後期所作的〈祭旗後一日，六保背約，縱匪反噬，燬陷義莊無數，獨山頂一帶尚守前盟；予一家四散，幾遭闔門之禍，在重圍中瀝血成詠〉以及〈殉難三烈詩〉等詩作內容看來，戴軍陣營是如此的殘忍嗜殺，為何他卻沒有被殺害呢？

其實，戴案初起時，並不隨意殘殺官民，吳子光就說：「（戴萬生）作亂時頗學宋襄公仁義，以不殺為名」，^[142]可見戴氏頗以仁君自命；後來他被丁曰健殺害之後，民間還在他故居附近蓋了一座小廟予以奉祀，隱稱曰「查封公」，由此亦可知戴氏的民間形象不像那些清廷官方或地方文人社群筆下的「戴逆」那般不堪。陳肇興〈山居漫興〉詩中也隱約透露此意說：「豺虎怨庸才」，可見當時該地區即使是支持戴潮春的地方豪強，對陳肇興其實也禮讓三分，才能讓他平安寄居在民居之中，並且寫下前文所引述的那些抒發山居閒趣之詩作。同時代的另一位中部重要文人吳子光在逃難路途中也曾經遭遇過戴軍，事後作有〈紀變絕句（共四首）〉，其三云：「昆池劫火到東瀛，班馬中宵似有聲；十萬黃巾低首拜，前車恐是鄭康成！」，詩後有小字自註：

[141] 林豪《東瀛紀事》，前引書，頁30。

[142] 吳子光《台灣紀事》，前引書，頁53-54。

「時賊鋒甚銳，^[143]尚未至逢人即殺，故云」，^[144]由此亦可知當時氛圍的確並不若中後期那般劍拔弩張、腥風血雨，這也是這個時期的陳氏詩作整體內容較少殺伐之氣的原因所在。

本文透過破譯陳肇興詩中的借喻、象徵以及化用典故等，冀圖解讀其作品中所蘊含的多層意義。由前述可知，陳肇興對於典故的運用頗為得心應手，其實可以用法國文論家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所提出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或稱「文本間性」）理論解析之，另一位法國著名文論家熱奈特（Gérard Genette）在《隱跡稿本》則進一步分析為五種「跨文本關係」，分別是「互文性」、「副文本」關係、「元文本性」（或稱「評論關係」）、「承文本性」以及「廣義文本性」。^[145]對於第一種的「互文性」關係，熱奈特對其下了簡要的定義，並且再細分為三小類：

兩個或若干個文本之間的互現關係，從本相上最經常地表現為一文本在另一文本中的實際出現。其最明顯並且最忠實的表現形式，即傳統的「引語」實踐；另一種不太明顯、不太經典的形式，即秘而不宣的借鑑，但還算忠實；第三種形式即寓意形式，明顯程度和忠實程度都更次之，寓意陳述形式的全部智慧在於發現自身與另一文本的關係，自身的這種或那種變化必然影射到另一文本，不然便無法理解。^[146]

在前文針對陳肇興詩作所進行的細部探討之中，同樣發現其詩作與中國歷代的文學與歷史文本有著錯綜複雜的「互文性」關聯：有利用相同的詩題以表達類似情感的〈詠懷〉，也有直接在詩句中歌詠歷史人物或事件者，如「弦高犒秦師，荊軻度易水」與「仲連恥帝秦，正平辱罵曹」等，這些是較為顯明易見的互文性關係；亦有較為隱微者，如「九畹長莓苔」之指向〈離騷〉以

[143] 該字頗為潦草，鄭喜夫辨認為「單」字，不過文義不通；筆者以為稍似「甚」字。鄭文見前引氏著〈吳芸閣先生年譜初稿（二）〉，頁105。

[144] 吳子光，《一肚皮集（七）：芸閣山人集》（台北：龍文，2001），頁87。

[145] 熱拉爾·熱奈特著，史忠義漢譯，《熱奈特論文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頁69-74。

[146] 同前註，頁69。

及「樹頭喔喔晨雞鳴」、「雞鳴非惡聲」之指向〈詩經·風雨〉等，縱使不明瞭其背後的典故知識，讀詩過程的意象流動亦不致中斷，只是若具備此先備知識，則會有更深一層之體認。由前文所分析的近五十首詩作中發現，陳肇興運用典故並非以之炫學，亦不至有楊炯「點鬼簿」與李商隱「獺祭魚」^[147]之譏，用典恰到佳處，亦使得有限的篇幅中，容納了甚深且廣的意涵，大幅提高了作品內容之密度。

最後，透過本論文實際操作，以「微觀」、「細讀」的手法探究陳肇興的詩作，筆者發現，施懿琳所提出的：中西文學理論的援引對於台灣古典文學研究應有所助益^[148]，洵為至言；而許俊雅所說「史料的蒐集對台灣文學研究深度開展之效，是不容忽視的」^[149]，更為確論，若能對史料積極搜尋與深入探討，將不至於還在承襲連橫《台灣通史·陳肇興列傳》而說他是「咸豐八年舉人」之誤^[150]，也不會有「武西堡，即今集集」^[151]之誤，更不會說陳肇興在日治開始之後，「曾短期內渡大陸，遊榕城，玩鼓山烏山，留下詩作」^[152]這類讓人驚詫不已的敘述，而前文所述的一些相關研究文獻對於陳肇興詩作解讀的些許差池亦可避免。筆者本著野人獻曝之誠，略抒芻蕘之言，錯謬之處，諒必多有，尚請各界方家指教。

參考書目

如附註所引，為節省篇幅，不再重複列出。

[147] 前者見張鷟，《朝野僉載》，後者見楊億《楊文公談苑》。

[148] 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前引書，頁16。

[149] 許俊雅，前引文，頁632。

[150] 陳貽庭、張寧、陳慶元，《台灣才子》，前引書，頁66。

[151] 賴熾昌等，《彰化縣志稿》（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頁1444。「武西堡」包含區域為：「今埔心鄉全部、永靖鄉大部分，田尾鄉一部及社頭、員林、溪湖等鄉鎮一小部分」，而今集集則分屬當時的集集堡以及沙連保、沙連下保，參見洪敏霖，《台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下）》（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頁13-20。

[152] 包恆新，《台灣知識辭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頁50。

The Micro-Examination Attemp for the Taiwanese Classical Poem:

Take Chen Chao-hsing's Poetry that Writed in Dai Chao-Chun Emergency Initial Period as the Example

Ko, Ming-Yau

Part-time Lecturer
Central Uiniversity

Abstract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recently, the research of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of Taiwan had very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The older generation's scholars not merely issued many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they also continued leading young scholars diligently, obtain the rich harvest. At reviews and prospects, the "microview" or the "read in detail" should be worthy to be approve.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target of this thesis is Chen ChaoHsing (1831-1866?), the important poet in middle part of Taiwan in Ching Dynasty. He has gone through the incident of Dai ChaoChun, the longest (1862-1864) mass uprising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 Chen lived for 2 years in the key-area of Dai's sphere of influence, wrote a lot of very naturalistic poems at that time, recorded this incident by his porms. About the theme of social turmoils and wars in classical poems of Taiwan, Chen is all champions in the quantity or deepness of the poems. I selected 47 poems and makes them for focus of studying. They were writed in the period from "shortly before the incident breaking out" until "Chen plotted to assassinate Dai". This paper investigats the allusions used in the poems, analyses the cultural codes, explains their background, makes use of relevant historical documents, realizes deep meanings between Chen's poems, discusses with other scholars, explores the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value of these poems, finds the poet's real appearance clearly, and examines the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again. Finally, I hope the importance of this kind of research approach can be valued.

Key word: The incident of Dai ChaoChun, *Poetry anthology of Chen ChaoHsing*, the Literature of Changhua, Neo-historicism, Taiwan in Ching Dynasty